一五一十周刊

NO. 104
2013年 4月26日



编者的话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发生里氏 7 级地震，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志愿者赶往现场，更多民众则通过献血、捐款、捐物等方式向受灾同胞给予帮助，全国再度掀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救灾潮。很多人说：这一次，我们都是雅安人。

这一切行为的源头，正是本期周刊月末版想要与你分享的话题，也是“精神生活三部曲”的结尾章——“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自然灾害、疾病、环境污染，天灾人祸无一不摧残着人类的肉体和精神。让我们在冰冷的苦难下得以顽强生存、重新出发的动因，往往依赖于他人的同情，依赖于人间珍贵的关怀与温情。地震中大批志愿者的雪中送炭；地震后专家坚持不懈的研究质疑，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文化人晚年“叛变”毅然投身环保事业；裹足老妇走遍中原大地调查病患……这些人凭一己之力对抗苦难的勇气都来自于他们“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情怀。

这样的情怀究竟源自何处？古今中外都有无数对同情心的定义和解释，孟子比喻“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推理恻隐之心非起于自私的动机，它是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叔本华认为慈悲心即道德之奥秘 ；到了休谟口中，同情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情感传达的机制，并非具体情感；而亚当·斯密也将同情视为心理机制，他指出，当事人的激情和旁观者的同情共感之间的立场互换，以及由此而调整激情程度的能力，是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更有当代心理学家研究称同情心是天生的，但是环境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从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非常重要。

触动同情的情感机制千千万万，会受到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影



响。然而，有了同情心，并不一必然能够作出道德行为。今天，爆炸、枪击、投毒、见死不救事件频发撩拨着人们脆弱的心脏，朱光潜直斥："教育家们睁着眼睛看青年堕落，政治家们睁着眼睛看社会秩序紊乱，富商大贾睁着眼睛看经济濒危而漫不在意，如果我们回答说：'这心肝缺乏恻隐。'也许有人觉得这话离题太远。其实病原全在这上面。"各国似乎都苦恼于人性日趋淡漠、无情、甚至良知泯灭。美国精神疾病研究者更将完全缺乏共情能力和悔恨心的人划为患有"冷血症"，俨然列为精神疾病。

这困恼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尚没有确实的答案，毕竟人类原本就是在善与恶的交缠中蹒跚向前，但至少在前往芦山的志愿者身上还能看见希望。

愿逝者安息，生者同情永存。



目录



【PART 1：无法遏制的同情！】

何丽：芦山地震灾区的志愿者们


何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导致道路严重阻塞，警察开始指挥后面的汽车掉头返回。

”

上周六发生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破坏力巨大的地震，对廖文俊（音译）的打击很大。

在靠近震中的胜利村的一家解放军医院，这名 30 岁的医生在午休期间放下饭碗，回顾这个已导致近 200 人死亡、1.2 万人受伤的创伤性事件。“我有一些亲戚被埋在废墟下，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救出来，”他说。

他指着房屋大面积倒塌、就像散落的火柴一样堆着的主要街道，然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地补充说：“我家的房子就在那边。”

在胜利村以及芦山县境内其它严重受灾地区，地震造成的破坏比比皆是。芦山地震是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地震。

在胜利村的主要街道上，散布着脱落的横梁和受损的家具，仍未倒塌的建筑物岌岌可危，不能进入。

“快点出来！”一名军官在看到一个同事试图从商店购买电池的时候大声喊道。

昨日当地仍不断发生余震，村民们每次感觉到地动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动。不过，胜利村及邻近村子的情况与 2008 年导致 9 万人死亡的汶川大地震不可同日而语。



那场灾难之后的一大进步，就是公民参与救灾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导致道路严重阻塞，警察开始指挥后面的汽车掉头返回。昨日稍后，中国国务院宣布，为减轻交通拥堵，只允许官方组织进入灾区。

“2008 年，我们都捐了钱，但这一次我们决定自己赶来出一把力，”一名骑在轻型摩托车上的男子说道。他的两个朋友骑在另一辆车上。“我们在自己的县里也感觉到地震，但我们知道灾区的情况糟糕得多，所以我们想要尽力而为。”

其他人则更有组织。来自华东杭州市的福音派基督徒冯光良（音译）介绍说，他所在的教会在 2008 年四川地震后组建了一个快速反应团队。北京方面对宗教活动严加管制，但在危机地区，独立教会的工作日益得到容忍。

“我们希望有一条途径显示主的爱，”冯光良表示，“我们买了一辆汽车放在成都待命，这样我们在发生地震后能够快速赶来。”

政府试图通过官方的志愿者计划来调动救灾热情。

“我们报名成为志愿者时，有几百人排队，”21 岁的杨亚（音译）表示。他和几个朋友举着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中共党旗在胜利村走来走去。但这些在附近的凤凰村长大的年轻男子不太清楚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政府的快速反应救援团队也随处可见。在靠近灾区的狭窄山路上，挤满了挖土机、水车、救护车和军车车队。移动通信网络的维修人员也投入抢修，截至昨晚，大部分地区的手机服务已经恢复。

但并不是所有官方救援努力都顺利展开。运载着数千顶帐篷的一个车队无法抵达灾区，因为这些卡车太大了，无法在山路上行驶。

结果，很多家庭在街上搭起的简易小棚里度过震后第一晚。村民们还抱怨缺乏食物和饮用水，因为供水中断了。

“很多人来到这里，但他们都空着手来，”太平镇一个村的原村长袁实华（音译）抱怨道。“医生有很多，但我们没有水，也没有电。昨天、今天都没人送基本必需品来。”

（文章来源：FT 中文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汪韬：三年重建，隐患不休——民间地质学家杨勇发布汶川震区考察结果


汪韬：《南方周末》记者。

“

杨勇是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治理荒漠研究基金会专家。2011 年是他汶川震区系列调查的第三年，也是他关注该地区的第十五年。

”

注：原文发表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

灾后重建

汶川震区重建三年以来，泥石流、塌方等次生灾害在扩大，主要原因之一是重建工程、工矿企业新扩建造成的二次破坏。急于求成的灾后工程建设，可能已到了窘迫的埋单时刻。

削为平地的龙门山山顶上大型矿车来回穿梭，陡峭的山坡上不时有碎石滚落，茂密的森林中延伸着一条条白色的岩石碎屑流。

这是杨勇在都江堰拉法基水泥厂露天采矿场看到的景象。“汶川地震灾后，产业和企业获得了项目落地和扩能机会，龙门山新增了不少采矿区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2011 年 8 月 16 日起，他在龙门山地震灾区进行了近半个月的实地考察。

这名地质学家以独立调查蜚声业界。“灾后重建工程和资源型产业的恢复给灾区地质、环境承载力带来了重压。”9 月 11 日，杨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显得忧心忡忡，泥石流、塌方等地震次生灾害给灾后安置地造成的困境远远超出外界预料，而一些灾后重建项目、矿山的新扩建可能会加剧这种危害，环保、安全生产管理不善也对环境和安居带来了不利影响。

龙门山亚东水泥厂露天矿山，山顶被削平。





地质灾害在扩大

杨勇考察区域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东缘之间的龙门山断裂带，断裂带长三百多千米，是汶川地震所在地。震前就属于地质灾害多发区，四川、甘肃和陕西省的上百个城镇都受其影响。作为四川省的富矿带，多年的采矿活动和地震的破坏已“伤筋动骨”。

杨勇是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治理荒漠研究基金会专家。2011 年是他做汶川震区系列调查的第三年，也是他关注该地区的第十五年。

“现在看来，这两年的灾害形势和我们 2008 年地震后的预期一致。”王玮玲说。她是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教研室地理老师，曾与杨勇在龙门山断裂带考察。

2008 年底，王玮玲看到一些重建项目和安置区就建在塌方区域的旁边或是河滩上，一旦发生泥石流、塌方就危在旦夕。“当时我们就提出灾区重建要审慎。这两年我看到灾区发生泥石流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了。”正如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马东涛所说，汶川震区的次生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和面积都扩大了，并将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在汶川县漩口镇原蔡家杠村村委会主任刘平的印象中，震前并没有这么频繁的泥石流，现在则成家常便饭。“雨大点就有泥石流，震后一直是这样，今年已经有三次了。”

2011 年杨勇这次考察，地质灾害随处可见。在石坎河，泥石流几乎填平了沟壑，从杨勇提供的照片上看，狭窄的河床变成了宽阔的“碎石公路”。每年汛期，山区不少村庄都成为孤岛，不能进入。

地方政府投入在增加，却如杯水车薪。据当地媒体报道，2000 年四川省投入 300 万元，2006 年为 1 亿元，2011 年则达到 20 亿元。然而，四川省有 2 万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其中 2300 多处被列入重大治理工程名单，仅绵竹市清平乡文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就已耗资 2 亿元。“治理工程仍需要时间、资金和可行性方案。”杨勇说。



高川磷矿灾后恢复生产,造成大批植被破坏。

重建隐患

灾后重建工程和工矿企业的扩建，是杨勇极为担忧的地质环境破坏性因素。杨勇认为，灾后重建给灾区产业调整升级和环境改善带来了机遇，但是随着重建的推进，似乎没有按照这一路径发展。

他特别提到了在建设中的都汶高速公路。这条于 2003 年开工的公路全长 82 公里，震后，被当地官员认为是汶川地震“生命线”213 国道的理想替代方案。

这次考察中，杨勇看到支撑路面的桥涵下岷江河床上堆积着泥石流冲下来的碎石，有的甚至超过了路面。这种灾害随处可见。

“都汶高速公路沿着岷江河谷延伸，建设大量隧道、桥涵、开挖边坡，清理滑坡体都会对破碎的地质结构产生扰动。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工程，建成之后也将长期接受地质灾害的考验。”杨勇说。对此，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唐邦兴也谈道，“路哪里坏了就修哪里，费用高，效果差。我们曾经建议改道。”

另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是，沿着龙门山脉的工矿企业在灾后恢复生产并逐渐扩建，这是杨勇最为关注的问题。

“从林立的烟囱和新增生产装置的更新可以看出，一些小厂可能关闭了，但德阳和绵阳地区的磷化工产业群和生产规模似乎较灾前扩大了，这需要增大磷矿石开采量来支撑。”杨勇说。

以法国拉法基集团和中联集团水泥项目新扩建为标志，北川、彭州和都江堰几个地区都新上了水泥项目，水泥矿源均来自龙门山大规模的露天开采。

根据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下称拉法基）矿山扩建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灾后重建需要大量优质水泥，而市场缺口非常大。”2009 年，公司已公示筹备扩大产能，为此将对石灰石矿山及页岩矿山进行扩建。矿山均位于都江堰。

除了工矿企业对地质的影响之外，扩建的工厂也可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在岷江河谷、龙门山水系上又恢复并新扩建了许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而这些生产活动区都是成一绵一广经济带、成都平原城市群落的水源地。”杨勇说。

刘平已隐隐感到了这种不利影响。“现在地里庄稼不收，经济作物像猕猴桃和药材也种不活，山上的树也开始死。”村民怀疑是附近一家灾后重建的铝厂造成的。一位在铝厂工作14 年的工人李师傅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称，2008 年重建时环保设施的确没有跟上，今年才逐渐到位。



安居不乐业

“被地震破坏的工矿和化工企业要恢复生产，政府要进程和速度。但是，在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之下，思考不冷静、措施不谨慎就会使重建埋下许多隐患。”汶川地震两周年前夕，杨勇就曾在接受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采访时说过。

事实上，重建工程及工矿企业的扩建项目应当有环评审查，但却形同为企业和项目背书。如拉法基扩建的环评报告书中就提及：“排废场有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隐患”，但“矿区开采施工工艺符合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总体要求，从水土保持角度，本项目建设是合理可行的”。

杨勇的考察认为龙门山地区已难以承受再次破坏，他曾撰文称：“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中已形成了大面积、大净空的矿山开采区和剥离采场。海拔 2500 米以上的含矿层基本上已采空……5·12 地震中，该区成为次生地质灾害最快速和最明显的响应区，形成了密集巨量的地质灾害群和丰富的泥石流物源。”

每年汛期，矿区道路均被破坏，矿区难以进入，安监部门规定，汛期矿区需停止开采。可见增大开采量的影响深远，需要谨慎评估。然而，为了快速恢复重建，很多项目的评审速度加快，程序也简化了。“和地质灾害相关的项目，我们评审了很多，以前做两三年的评估，现在一两年就上了，甚至没有审查，只叫做‘排查’。”唐邦兴说。

“我国的环评中几乎没有公众参与，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也有待提高，环评的结论没有考虑多方利益。”杨勇说，“也没有强硬的约束机制让企业来承担责任。”

“每个阶段的首要目标不同，地震刚过后，以抢修安置恢复为先。”马东涛说，“但是现在三年了，一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与我们当初的想象和预估发生很大改变，一切都要冷静思考，科学应对，是时候为我们当时的盲动埋单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梁文道：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


梁文道：专栏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

“

盯着，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不仅仅是为了让重建的过程透明，不使任何人有可乘之机；更是为了守住半年前那股信念，不让它彻底燃尽。2008 年，大家的情绪被点起来了；2009 年，热血应该转换成冷静、绵密、细致的长期工程。

”

注：原文发表于 2009 年 1 月 8 日

四年前，南亚大海啸震撼全球。一时间，各国纷纷伸出援手，加上民间自发的募捐救助行动，结果创下了人类史上最大笔的善款数字，情景相当感人。然而，有过分冷静甚至冷酷的评论家不合时宜地在大家热透的头上淋冷水。当时就有这么一位专栏作者把大伙捐钱的行为比作中世纪的“赎罪券”——花了钱，良心安稳了，于是天堂之阶的砖也就铺得更加踏实。这话听来可恨，但他却预示了一个刺眼的现实：许多国家允诺过的捐助在两年之后仍未兑现，一些捐了出去的物资款项则莫名其妙地不知所终；至于一般热情如火的媒体，终于也渐渐凉了下来。一般大众，要不是到了周年纪念日，更是不会想起四年前那幅巨浪滔天的可怖画面。因为那里不再出新闻。

大众媒体不只是我们认知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还根据外在的条件限制与自身的逻辑决定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比方说“事件”，对大部分人来讲，所谓事件就是新闻报道过的事。新闻出来了，事件就开始；如果新闻在逐步渐少，就意味着事件快要结束了。问题在于新闻事件并不完全对应活人的命运，往往电视上它形迹渐远，事件的主角犹自苦苦挣扎。例如“黑砖窑”。2007 年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如今看似尘埃落定，因为报上再也没有后续的报道；但当时失踪了的奴工真的全找回来了吗？有关责任人全受到彻底的调查和惩处了吗？



汶川地震是 2008 年最重要的新闻事件，它触发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自助运动。想当时，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志愿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真正正是同舟共济。后来，我们陆续见到很多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听到不少温情脉脉的重建故事。于是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这件事快要过去了，以为原来的悲剧逐渐转成喜剧，一切都朝着正面发展。

真相却是我们的“事件”结束了，灾民的日子才正要开始。春节将至，他们这年该怎么过呢？隆冬已至，大雪飘零，大家夏天送去的物资现在还够用吗？因为急切，有些断肢的灾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好完整的手术，每天拖着脚走路；因为一时间的冲动，有些孤儿曾经迅即被人认养，如今则带着残障的身躯，伤毁的脸孔，静悄悄地回到老家……预料中的心理阴影终于浮现，有人每晚恶梦，话说得越来越少。

还有人祸。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救灾工作里有十四亿人民币的缺漏。记得当时网民争议抗震物资和款项会不会被人挪用，有人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盯着，谁敢乱动？”现在恐怕难免失望。

盯着，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不仅仅是为了让重建的过程透明，不使任何人有可乘之机；更是为了守住半年前那股信念，不让它彻底燃尽。2008 年，大家的情绪被点起来了；2009 年，热血应该转换成冷静、绵密、细致的长期工程。爱心不是购买“赎罪券”，良心消费过后就万事大吉；它是种深沉的责任，承诺过的，终要实现；付出过的，要看着它开花结果。

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都有一句口头禅：“现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仿佛“关心”真的只有一下，一则新闻播完了，关心也就可以停止了。但是我们晓得，媒体的消费者和社会的公民是两回事，而汶川地震并不只是媒体产业制造出来的一种商品。

所以，当我们即将阖家团聚，欢度一年一度的春节时，不妨也把目光投向灾区同胞，为他们担忧，为他们祈福。或许我们的关切，能让他们的节日多几分温煦。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泉：梁从诚：饮冰的余味


张泉：《周末画报》作者。

“梁从诚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用“饮冰室”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取《庄子》中的句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与？”对国家与时代的热忱与焦虑，只能靠饮冰来降温。百年以降，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梁从诫，梁氏家族对国家理想的执著，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彷徨，就在“饮冰”的隐喻中反复而悲怆地延续着。2010 年 10 月 28 日，梁从诫的去世，让我们不得不再度反刍这些冰冷的余味。

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梁从诫这一代人在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根本无力企及祖父的高度，不是因为天赋愚钝，更不是因为不够勤奋。梁从诫后来用了一个九斤老太式的进化论来描述家族的理想与困境：“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现在我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

梁启超 18 岁时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的命运，一意孤行，以举人的身份拜只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而 18 岁时，梁从诫刚刚过完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梁启超 22 岁已经参与“公车上



书”，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主将，22 岁的梁从诫则仍在时代亢奋的旋律中彷徨地寻找未来；梁启超 30 岁时已经创办《新民丛报》，用自己纵横捭阖的笔力，持续影响着整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年长者，刚到而立之年的梁从诫却只能无声地目睹着父母的一次次失望与恸哭；梁启超在 40 岁后达到思想的巅峰，梁从诫却在江西的“五七干校”里消耗了最宝贵的 10 年。梁启超没有见过长孙梁从诫，他不知道，自己的声望于子孙们而言，不仅是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峰，更是无法承受的历史负担。他们终生都要背负着他的名字，因为他而遭排挤，而被批判，而耽搁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与祖父的任性不同，梁从诫几乎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的一生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梁启超在 52 岁时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而直到这样的年纪，梁从诫才终于可以开始认真构思自己的将来。

晚年“背叛”



图 1：梁从诫

叛逆的种子似乎一直埋藏在梁氏家族的血脉中。梁启超的 9 个儿女，无一人继承他的事业；梁从诫同样没有遵循父母的嘱咐走上建筑之路，父母给他起名“从诫”，希望他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北宋建筑家李诫的追随者，然而，他最终还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转投了历史系。对时代的使命感从未从梁氏家族的肩头挪开，他们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天真地将它们重新背负起来。

梁从诫在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收到读者来稿，他第一次发现，以发展经济为名，乡镇企业造成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情形十分严峻。此后，梁从诫决定投身环保，他在 56 岁辞去公职，61 岁创办“自然之友”，迅速成为一面旗帜。1998 年，“自然之友”募集了



40 万元基金，拯救藏羚羊。此后，保护滇金丝猴，治理周口店人类遗址的粉尘污染，保护四合院……在与权力和效益的拉锯战中，梁从诫勉力维系着这个民间组织的尊严。人们还依稀记得，2002 年《财富》论坛上，70 岁的梁从诫在经济巨头们面前拍案而起："为了市场份额，让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给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梁从诫最令人敬重的，不仅是这些显赫的行动，还有他多年来秉承的生活。当他还健康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老人，他去政协开会时也不例外，以至有一次被门卫拦在门外。他外出时一直随身带着筷子，坚决不用一次性筷子，他用废纸复印名片，他会收集被丢弃的矿泉水瓶。

如果没有这些来自晚年的"背叛"，梁从诫的一生或许真的乏善可陈。然而，与祖父那杆毫无遮拦的笔相比，与父亲那根在青年时代衡量长度、在晚年拿捏分寸的卷尺相比，梁从诫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了梁氏家族表述自我的权利，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留下了梁氏三代最后的声音。这种声音被他戏称为"爱国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e）。他从书斋走向更为艰险的世界，在 66 岁时登上昆仑山巅，点燃了焚烧藏羚羊皮的火把，那是祖父和父亲都未曾经历过的世界。

无声退场

也有人为"饮冰室"找到另一重含义，如饮冰凌，冷暖自知。梁氏三代都曾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自己的时代，也曾恭谦卑微地试图去迎合并匡扶一个时代，却最终发现，时代无情地辜负了他们。梁启超在日渐倾颓的国难中被庸医所误流尽了血，梁思成在北京城墙倒塌的烟尘里阖上眼睛，现在轮到梁从诫近乎无声地退场。他们都曾在自己的时代有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经历，然而，他们毕生致力的事业，都没有真正成功。

100 年前，同样的 10 月，梁启超的文章正像《圣经》那样在公众手中传播，然而，梁启超的理想依然被时代与庸众一道演绎成一场夸父追日的闹剧。61 年前，同样的 10 月，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在家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他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笃信未来，然而，被他视为生命的老北京仍在为新时代无声地让路。时代对他的称呼也逐渐改变，从梁教授，到腐朽的"大屋顶"，再到"年纪太大，用处不大，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他只有一句话来聊以自慰："50 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祖父被自己信仰的西医误杀，父亲被自己信仰的未来折磨，现在轮到梁从诫，梁氏家族沉浮的百



年间，那些从中国人身上流失的精神仍然未能复归，而对现代化盲目想象的恶果却已经集中显现出来，尽管“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理念已经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人，然而，环保依赖的往往仍是许多来自民间的力量。没有人知道，在失去梁从诫之后，这些未能完成的事业，还将面临怎样的波折与困境。

今年 1 月，梁思成、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故居，经过长达数月的拉锯战，终于获得有关部门的承诺，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暂不拆除。然而，直到梁从诫临终，他都没有看到那个承诺的兑现。据说有关认定仍在走程序，已被部分拆除的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命运目前仍是悬而未决。

（文章来源：周末画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周筱赟：高耀洁："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周筱赟：记者、编辑，专栏作家

"

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

"

一双被裹过的小脚只有 34 码，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说话略一激动，便喘息与咳嗽不止，这就是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尽管已是 79 岁的老人，但她对日期和数字却仍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 1996 年 4 月 7 日下午在一次会诊中遭遇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这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 42 岁农村妇女临死前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老奶奶，俺咋会得这脏病啊？俺不想死啊！"从此，高耀洁便义无反顾地踏上防艾之路，至今已近十年。

十年来，高耀洁用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 100 万元，包括她获得几个国际大奖所得的奖金总计 8 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截至 2005 年 11 月，她自费编印的宣传小报"预防艾滋病知识"已出 20 期，累计印数 102 万份，远远超过任何一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宣传量。所有书籍和小报，只要来人或来信到河南省文史馆索取（高是文史馆馆员，地址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4 号河南省文史馆，邮编 450003），一概免费赠送，如果对方没有附上邮票，高耀洁还得倒贴邮资。她能清晰地背出每种书的挂号邮资：《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是 3.8 元；《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是 4.5 元；《中国艾滋病调查》是 4.8 元；《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则是她的专业著作，是她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数十年的经验总结，高耀洁准备连同上述几种书一起陆续寄给全国各省市图书馆，邮资合计 10.8 元。在所有这些书中，她对《中



国艾滋病调查》的编校质量最为满意，出版社给她的两千册样书很快送光了，一位台商和深圳女企业家又买了一千余册赠送给她，高耀洁有点不舍得送，让人把一捆捆的书塞到靠墙的柜子后面，只有熟识的人来了才给。



图 2：高耀洁

与今年年初到郑州采访时相比，高耀洁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原本堆满客厅一面墙的书不见了，“这些书和小报只有全送出去才是胜利！”高耀洁用她浓重的开封口音说。她告诉我，从 2004 年 10 月至今，仅《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就送出去 4 万册，很多地方举办艾滋病预防培训班，专门派了汽车来拉。尤其让她高兴的是，邻省的几个县乡政府也专门派人向她来要书。但也有让她极为生气的事：某省级图书馆向她要了两万册书，答应逐级发给下属的各市县图书馆，但结果竟是高医生被经办人骗了。“他们发不下去也应该退还给我，我辛辛苦苦印的书怎么能去卖了废纸！我被他们骗了一次，不会再被他们骗了！”

“这些骗子都该杀！”

提到防艾领域的骗子，高耀洁立即怒气冲冲：“现在真是诈骗成灾！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太多了，真让我伤心！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

仅从 1999 年至 2003 年的四年间，在高耀洁收到的 8326 封来信中就有 812 封属于骗子信，都是自称发明了百分之百包治艾滋病的中药制剂要求合作之类。但从 2004 年开始国家出台各项艾滋病救助政策，社会各界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骗子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低劣的骗术，转而纷纷成立“孤儿学校”、“艾滋病救助协会”等机构敛财。有一个姓王的农民成立“艾滋病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所”，多次打电话和上门向高耀洁反映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得不到救助的问题，由于当时手头正好没钱，高耀洁提出先给对方寄上几百本书和小



报，希望他在当地宣传防艾，不料竟被对方拒绝，表示不需要防艾资料，只需要钱。这使高耀洁起了疑心，随后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雇车前往调查，在王某新建的三层楼房里从中午等到傍晚，也没看见一个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此后，听说王某的研究所搬到了北京郊区，发邮件、打电话向北京各高校募捐钱款，还跑到各国大使馆去要钱，不少大学生信以为真，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大学生就每人每天省下一块钱捐给王某，但后来前往实地调查竟发现，除了装修一新的楼房外，一个患者和孤儿也没有。

另一个农民丁老汉，原是村支书，他的二儿子、五儿子和两个侄子都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高耀洁对他很同情，每次他从村里到郑州，都要从高耀洁处取走几百本书和几千份小报去做宣传，高也不时接济他。2004 年秋的一天，他带着两个艾滋病患者家属提着五斤芝麻油来拜访高耀洁，说是让高尝尝自家新打的油，高给了他们每人 50 元共 150 元表示感谢。直到 2005 年 8 月 31 日，高耀洁才获悉丁老汉在 90 年代就是当地黑血站的头目，他从村里的艾滋病患者的政府补助款中扣除了 100 元，说这钱是那次给高耀洁送礼了。此后他拿着“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的名片上门，就再也不要宣传资料和旧衣物了，张口就只要钱。另一个村支书，高耀洁募集了一车的旧衣物委托他送到村里，不料他一回村，就把其中的好衣服挑走，看不上眼的就全扔了。“现在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钱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人来了说人话，鬼来了说鬼话，人鬼都来了说胡话。”

近年来高耀洁的防艾工作都围绕艾滋孤儿展开，按照高耀洁的定义，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遗孤，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高耀洁以前曾多次强调当前防艾工作的“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但现在她发现，比孤儿问题更急迫的是诈骗问题，“钱都到骗子手里了，孤儿能得到什么？诈骗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艾滋病救助工作！”“现在应该告诉所有人，尤其是有爱心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绝对不能盲目地捐钱！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味，借救助艾滋病的名义名义骗老百姓的钱，这些骗子都该杀！”当然，法律对诈骗行为视情节轻重有不同的量刑，“这些骗子都该杀”只是高耀洁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每每说到骗子的可恶和艾滋病患者的境遇，高耀洁常常激动得落泪。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骗子来打您的主意？

高耀洁：总有骗子在我身上打主意，我总结了有三个原因：一我是个老人，“一个老婆子还不好哄？”其实我不好哄；二我是个女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男权社会；三我是中医学院教授，其实我是个西医，来找我的很多人自称是中医，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医，竟然说有包治艾滋病的祖传秘方，艾滋病传入中国也才 20 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他们想不到我有分析能力，我还会派人去调查，我绝不会为了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



仍是“不受欢迎的人”

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感染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她的正直与勇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象征人物。2001 年在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奖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并向无法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2003 年 12 月 18 日晚，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吴仪副总理点名要求见高耀洁，并在下榻的黄河迎宾馆与高单独长谈近三个小时。高耀洁回忆那天的情形：“吴仪一见俺，就拉住俺的手说：‘老大姐，我比你小十岁，这里没有外人，你有啥事直接说吧。你以后有啥困难就直接找我。’”这无疑代表了中国政府已高度重视艾滋病现状，并决心最大程度地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尽管如此，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高耀洁仍然或多或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某些未公开的艾滋病高发区，竟然流传着“防火防盗，防止高耀洁来到”的民谣。甚至在某些乡镇，只要举报高耀洁到来，就可以奖励 500 元，而发现外地记者的行踪，奖励只有 50 元。一开始是基层为了所谓的政绩，怕一旦暴露会影响招商引资的形象，而现在则是怕公布了真实情况，国家就会要求当地加大防治的投入，这是一些基层贫困地区的官员不愿看到的。不过，至今还没有人去举报过，高耀洁说：“因为我做的事老百姓都支持，只有那些贪官才恨我。”

《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收录了一张华北某地非法血站的照片，照片上的农民争先恐后排队抽血，至今仍然在营业。“卫生部对单采血浆站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自己是正规的，那为什么要在半夜和凌晨抽血？一个人一星期抽两次能行吗？一个人一次抽 800 毫升能受得了吗？抽 800 毫升只给 80 块钱合法吗？”高耀洁这样质问。然而不仅报道没能发表，拍摄照片的记者还被迫离开了那家报社，而带高耀洁去的人被所在单位处分，当地一个村支书指着高耀洁的鼻子大骂：“你浑蛋！你想断我们财路啊！”高耀洁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你才是浑蛋！你要考虑民族的兴亡，不是光你一个人发财！”

2001 年 6 月 6 日开始，高耀洁连续接到两个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病人电话，都说“高老师你年轻时肯定很漂亮吧”？高耀洁很奇怪地追问，原来是某部门的人说高耀洁年轻时嫁过蒋经国的秘书。气得高耀洁找到某部门的主管人员大骂了一顿。高耀洁坚持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他们想在生活作风上搞垮我，但我在妇产科接触到的男的只有婴儿，就只有造出这样离奇的谣言来了。”另一件让高耀洁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是，2000 年 3 月 18 日，高耀洁去现在已是“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上蔡县文楼村访问艾滋病家



庭，拍了 30 多张照片，当时医院的书记、宣传部长、老干部都非常支持，但院长却以“我们省至今没有一例艾滋病人”为由把照片全没收了。现在她升任某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高耀洁每次见到她就向她要照片，“这些照片她一定得还我！她不还我就一直骂到死！到死我就不骂了。”

高耀洁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子女，“但是艾滋病人太苦了，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啊！”2003 年非典时期，医院派高耀洁的二女儿郭竞先去大桥上堵汽车，一天站 8 个小时，整整站了一个月。而郭竞先既非传染科，也非内科，而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高耀洁认为这分明是为了打击她，所幸郭竞先对此并不在乎。但同为医生的小女儿郭炎光由于受高耀洁的影响失去了工作，一气之下远走加拿大，却至今怨恨高耀洁。“我退休了他们没法直接打击我，他们就故意利用她来让我心里不好过。她多次打来电话，说‘你就是只知道为了你的名利管艾滋病人，从来不管我咋过的’，其实她应该理解我。如果为了名利，我安心做我的妇产科主任，退休后返聘开个专家门诊，早可以腰缠百万了。可是艾滋病是民族的危机，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记者：武汉的桂希恩教授也是著名的防艾人士，您和他联系多吗？

高耀洁：桂教授到河南时来看过我，他是个好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说瞎话。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就是桂教授最早发现的。桂教授那次和我说，你不应该和他们顶，不让你说就不说了。我说你比我小十岁，你以后还有说的机会，而我已经倒计时了，现在不说，将来就没有机会说了。桂教授说那他们就会打击你，我说我不怕打击，我就要拼上命和他们干架！

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

高耀洁还有一个儿子是某大学的系主任，儿媳是另一所大专的副校长，他们对高耀洁的防艾事业都没有多大的兴趣。高耀洁非常担心在她身后，她的子女可能被人利用成立以高耀洁命名的基金会等组织诈骗，所以她专门写下遗嘱，“我这个遗嘱一定要公布于众，我不能让自己身后的清白不保！”

遗嘱：

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 2003 年 9 月那场离奇的官司，2005 年又招来所



谓“108 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闹剧，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骗害他人，给中华民族丢脸。我死之后，也不能让这些家伙们在我名下行骗获利。

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黄河激流处，永远让她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我死之后，（你们）不能再受骗上当！切记！

高耀洁写于 2005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

所幸的是，高耀洁进行的已不是近十年前的“一个人的战斗”了。根据 2004 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 84 万人，遍及所有 31 个省区，其中 80%以上在农村，且已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更多的人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中，高耀洁把这些人比喻为七七事变前后投身抗日洪流的爱国青年。她口中经常会提到杜聪和李丹两个人。杜聪出生于香港，哈佛大学硕士毕业，仅仅由于一次在中原地区的旅行，便毅然放弃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副总裁的高薪，在香港创办了智行基金会从事内地艾滋孤儿的救助工作，高耀洁把手头联系的 164 个孤儿全托付给了他。

李丹则是在一次野外考察中误入艾滋病村，从此放弃了在中科院攻读天体物理专业博士的机会，毅然辍学从事救助艾滋孤儿的社会工作。

还有许多大学生尽管无法亲身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但高耀洁时常会收到他们寄来募集的衣物、文具、书籍等，委托她转交给艾滋病村的孤儿。不过有时也会让她哭笑不得，她在文具里发现数盒软盘，还有一支防晒霜。艾滋孤儿最迫切的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既没有电脑用，也用不到化妆品。高耀洁不禁感叹城里长大的学生对农村太不了解了。

高耀洁戏称自己现在是“用技术换劳力”，她的助手、中文秘书、英文秘书、打字员、电脑维修员、印刷工、搬运工……都是她曾经治疗过的病人。高耀洁是治疗妇科癌症和不孕不育症的专家，1990 年从医院退休后，却没有被取消处方权，单位领导的意思是希望她回去开专家门诊，被她断然拒绝。高耀洁告诉我，现在遍地开花的专治不孕不育症医院，基本上都是骗子，有一个原是她所在医院的药剂室的，现在成了不孕不育医院的院长，他女儿原是单位管后勤的，现在也成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了。“如果为了名利，我也去开不孕不育门诊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夫妻都愿意大把大把的拿钱出来啊。但我能推就推，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最新一期的小报，就是一位曾经的不孕症病人掏钱找印刷厂印的，总计 7 万份花了 7 千块。高耀洁要把钱给他，他说我 7 千块能买个儿子吗？国庆期间，高耀洁张罗着要把一批募集来的旧衣服送到疫区去，她找汽车站站长帮忙，站长马上爽快地答应



让他的司机专程跑一趟。“站长生了个儿子，司机的老婆吃了我开的药也怀孕了，买药只花了 30 块钱，所以给我干活可卖力呢。”

在高耀洁家中，我看到她将书拆包后的包装纸一张张叠好，将塑料打包带撕成一条条连起来做绳子用，觉得她不免过于节省了。高耀洁告诉我：“我这不是抠啊，我是能省就省，因为用的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买，又没有地方报销。我的钱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尽管如此，高耀洁却固执地拒绝一切现金捐助，她担心上当受骗，也不愿沾钱后成为某些人造谣的口实。台湾歌星姜育恒到洛阳演出，辗转打来电话，愿意捐 30 万人民币，高耀洁答复他不要说 30 万，30 块也不敢收。新浪网打来电话要捐 10 万，也被高耀洁拒绝。有一对年近七十的香港老夫妇专程到郑州找了半个月，才找到高耀洁家，坐着不走一定要留下 2 万块钱，高耀洁后来只得叫来印刷厂厂长当场开具发票，将这笔钱用于印刷小报。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去专家门诊坐诊呢？这也是救死扶伤啊。

高耀洁：我认为用技术挣钱是挣不完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多为民族着想！中国缺少的不是妇产科医生，但真正愿意做防艾工作的人却太少了。

两个医生的“不健康”生活

高耀洁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双脚时常浮肿得厉害。她的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留不住食物，所以随时要吃东西。她出门时都随身带着一盒糖果，这倒不是她贪嘴，而是患有严重的低血糖。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比她大一岁，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曾担任所在医院前身的门诊部主任。他的高血压比高耀洁厉害得多，得靠进口降压特效药维持，还患有严重的肾病。从 2004 年 11 月至今，几乎都在病房里度过。高耀洁也住在医院里陪护，因为郭明久性格内向，穿衣入厕只有高耀洁来服侍才安心。严重的高血压使得郭明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高耀洁也整夜无法入睡。老伴的病让高耀洁的体力和精神大不如前。

趁国庆放假，两位老人暂时出院回家过节。郭明久只有躺着才稍微好受点，高耀洁在客厅忙着整理送疫区的衣物，把要寄到各地的书和小报捆好，不时进卧室看看老伴的情况，郭明久总是觉得口干，得随时用吸管让他喝水。

两位老人平时生活上极为节省，一天的伙食费一般不超过十块钱，通常就是咸菜、馒头、玉米糊糊，有客人来时会多一盘炒鸡蛋。但国庆的餐桌上，却多了鸭肉、鸡翅等荤菜，这是在南京工作的侄女特地带来孝敬高耀洁的。高耀洁让保姆把鸡翅用油炸得金黄，她的牙不好，用手指一缕缕撕下来翅，一个劲说好吃。我说蛋白质经油炸或火烤会产生苯并芘，



这是国际公认的强烈致癌物质，您作为医生难道不知道？她放下筷子想了想，说苯并芘我知道，但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多大关系吧？高耀洁又让我吃刚从超市买的小粽子，粽叶碧绿，我说这粽叶是色素染的吧，如果是叶绿素的话，经过高温蒸煮早变黄了。高耀洁又想了想，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过这点？那次晚餐我吃了三个大馒头，喝了两碗玉米糊糊，又吃了不少菜，肚子实在塞不下了，她还得让我吃，说："别浪费了，现在还有人吃不饱饭呢。"我说如果吃得太多把胃撑坏了要花钱治病，那浪费的钱更多。她说不会的，因为胃有延展性。

趁着老伴睡着了，高耀洁悄悄告诉我，在这次出院前，郭明久突然被发现咽喉部有白斑，而白斑是癌变的典型症状，"我怀疑老头得的是咽喉癌。"我问："你们两位都是主任医师，怎么会到现在才发现？"高耀洁说确实是疏忽了，当时他只是口干、嗜睡，一直作为抑郁症来治疗，完全是误诊了。那晚离开前，因为忙碌了一天，高耀洁说觉得精疲力尽，我建议她把电话拔了好好睡觉，她却说不行，因为可能会有病人半夜打来求助电话，有时还哭哭啼啼的，不能不接的。

记者：郭爷爷这一病，对您影响很大吧？

高耀洁：老头这一病，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但我的《十年防艾路》快写成了，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了，一定要完成。如果他真是癌症，我的精神也全垮了，到今年 12 月 29 日我们结婚就 52 年了，我不能不管他，实在不行我要带他到北京看病。我如果垮了，以后会怎样实在不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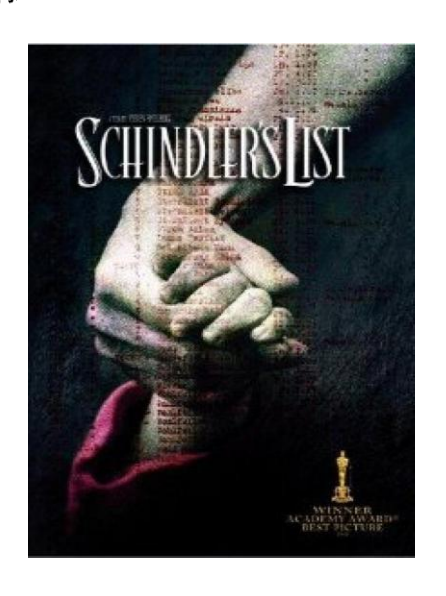
本文发稿前，记者通过电话获悉，郭明久被确诊为"晚期咽部高分化率鳞状上皮癌"，已从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房转入省肿瘤医院。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编辑推荐：

影片《辛德勒的名单》





1939 年，波兰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党卫军对犹太人进行隔离统治。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连姆·尼森 Liam Neeson 饰）在德军统治下的克拉科夫开厂生产军需用品，工厂雇用犹太人工作，大发战争财。1943 年，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辛德勒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贿赂德国军官，让自己的工厂成为集中营的附属劳役营，也成为了犹太人的避难所。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越发疯狂，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 1200 人的名单，倾家荡产买下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环保团体：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是中国一家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1994 年 3 月正式注册成立，致力于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支持全国各地的会员和志愿者关注本地的环境挑战。组织以开展群众性环境教育、倡导绿色文明、建立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宗旨。自然之友最近五年的工作重点是回应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城市环境问题，通过推动垃圾前端减量、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改善、低碳家庭和社区建设、城市自然体验和环境教育等，探讨和寻找中国的宜居城市建设之路。



【Part 2：众说纷纭的同情...】

Tim Madigan：道德的基础：借我一双慧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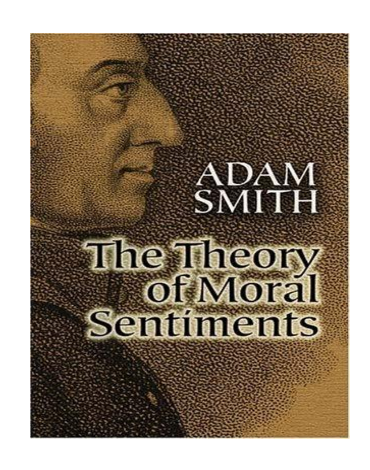


Tim Madigan：作家，记者，主要著有《The Burning》《A Life Among Humans》

“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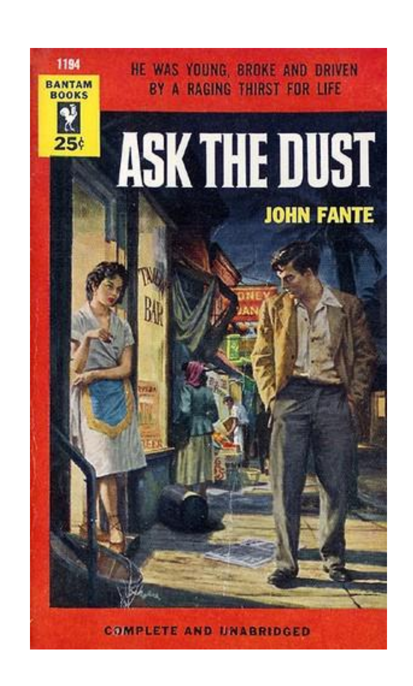
”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斯密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开头所写到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



一无所得。”（摘自《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译注）叔本华同样认为慈悲确实是道德的起点，但他还坚信找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他批评了斯密及其朋友兼支持者大卫•休谟，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试图逃避形而上学。



一个人能从多大程度上看到别人眼里的世界呢？一个人如何才能以某种方式分享别人的感受的？鉴于斯密和叔本华都认为小说家常具有捕捉这一现象的能力，而且阅读文学作品是培养理解别人生活境况能力的绝佳的途径，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是如何成为可能的。John Fante 于 1939 年在小说《问尘情缘（Ask the Dust）》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青年作家 Arturo Bandini 居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洛杉矶，他心仪的姑娘 Camilla 请他评论一部由他情敌 Sammy 创作的短篇小说，酒保 Sammy 和 Camilla 在同一所酒吧工作，因为肺结核的缘故将不久于人世。吃醋的 Arturo 心想，“Sammy，你可是落到我手里了！我要把你大卸八块！我要让你生不如死！Sammy 小儿，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神笔 Bandini 的笔锋如剑吧！”他给 Sammy 的短篇小说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正当他要寄出这篇评论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制止了他：他突然感觉到了 Sammy 当前的处境，以及这封信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Arturo 开始反思：

“一想到这个可怜之人的悲惨命运，便袭来一阵骇人的感觉。我向南方的星空望去，我知道那片星空之下的某个棚屋里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男人，他可能会比我更早地被沙漠吞噬，而我手中可以促使其发生。处在南方的圣安娜沙漠，象征着他面对残酷命运叩门声所进行



的无谓斗争。凶手还是酒保还是作家都已不重要：他的命运就是大家的命运，他的结局就是我的结局。今夜窗外此城中，还有千千万万跟他和我一样的人，如枯萎的草芥般渺小，以至于个体间的区别根本无法分辨。活着已是异常艰辛，而死亡乃至高终点，Sammy 已经接到了死神的传唤。我踌躇在邮筒旁，用头抵着邮筒，为 Sammy 感到悲伤，为我自己感到悲伤，为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感到悲伤。原谅我吧，Sammy！请原谅我的愚蠢！我踱回自己的小屋，花了三个小时为他的作品写了我能写出的最好的一篇评论。”

究竟是什么让 Arturo Bandini 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更确切地说，斯密和叔本华会如何评价 Bandini 的这种道德行为？

休谟在《人性论》（1739 年）中表示，同情即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做出相对客观的道德判断。休谟这一论述影响了斯密。此外，休谟还在《人类理解论》（1748 年）中表示，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我们为何会对他人抱有仁慈或同情心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就足够了。在寻求原因的不归路上，我们必须在某处停下下。”斯密在探究人类这一特质时，似乎也是认同他这位朋友的建议的。他在探讨这一特质时，并没有深究其根本原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加细致地将其发扬光大。斯密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别人的身体或心理状态，但道德个体可以借助想象力、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识别别人经历过的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此时人们认识到别人和自己其实并无二致。

叔本华深谙英国经验主义，他尤其欣赏的是休谟。叔本华曾经想把休谟关于宗教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叔本华的英国“粉丝”Patrick Bridgewater 在他的书中巧妙地展示了叔本华对英国和英国作家钟情的起因。1803 年时叔本华只有 14 岁，这位德国哲学家在一所典型的英国寄宿学校当了三个月的学生。这是他父母在环游世界的途中安排的，主要原因是他母亲无法忍受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尽管叔本华很不喜欢学校里那种浓烈的宗教气氛，但语言天赋极好的他在此学会了英语，并在余生中一直保有英语阅读的习惯。后来他的作品中确实也不时地穿插了一些他从《泰晤士报》中摘录的事例。通过他的老师和他自己如饥似渴的阅读，他开始接触了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他欣赏休谟、托马斯•佩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清晰的思路，以及他们对经验事实刨根问底的态度，并试图在自己作品中对其加以模仿。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作品，并在他重要作品《论道德的基础》（1837）中对其加以引用。Bridgewater 在书中说：“在叔本华版的‘道德情操论’（即《论道德的基础》——译注）中，叔本华用英语写道，斯密道德体系的核心其实是荣誉感，即渴望他人的赞许，更确切的说，这是斯密所认为的道德的基础。叔本华还



说：‘从斯密的全部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套非常绅士的道德体系，这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可是亲爱的好好先生，这可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很显然，叔本华认为斯密论述的道德体系过于关注教导年轻人如何成为绅士，并学会如何在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但“荣誉感”这种想在自己所属阶级同胞的眼中显得有价值的渴望，是不足以成为道德准则的基础的。道德的基础一定是一种超越阶级成分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斯密自己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概念中看出些端倪来。

再回到《问尘情缘》的例子中。按叔本华的观点，斯密可能会认为 Bandini 之所以选择不将那封抨击信寄给垂死的 Sammy，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人。整个小说故事中的 Bandini 确实是想做一名绅士，但这真的是他行此善的原因吗？当他克制自己不寄那封信时，只有天知地知、他知 Sammy 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不寄信的这个选择，就连他的挚爱 Camilla 也不例外。既然如此的话，Bandini 到底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决定呢？

斯密对此的回答稍后我会讨论，在此之前还是先说说叔本华自己是如何在《论道德的基础》中讨论道德的基础的。叔本华认为斯密没有充分理解同情心的本质，并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抨击。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男青年 Caius 和 Titus，他们都想谋杀各自的情敌，但到最后一刻都改变了主意。叔本华觉得斯密对此可能会说：他俩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引起目击者的同情，但叔本华认为这绝对不是他们做此决定的真正原因。叔本华写道：至于 Caius 要做出何种解释，读者自己作出决定（处于相同境况的两人，其实是叔本华用来进行对比的。他在 Caius 所给的理由中套用了费希特、斯密、斯宾诺莎等前人的各种理论，而 Titus 所给的解释是叔本华自己指定的，以此说明前人理论的荒谬之处——译注），但 Titus 会说 “真要做准备去杀人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已不是自己对那姑娘的激情，而是那个情敌。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此时，同情和怜悯袭上心头，他的遭遇让我感到难过，我实在不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摘自《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73 页——译注）”叔本华认为这种“（别人之）感（如）同（自己亲）身（感）受”的同情心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是一种纯粹的动机，并不被想在别人眼中表现得比较善良的心理所影响，而是一种将别人的痛苦和自己联系起来的纽带。在叔本华看来，Bandini 打破了人我隔阂的幻象，看到了 Sammy 作为自己的同类和自己之间的那个更为基本的纽带。叔本华斥责斯密和休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致使他们止步于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探索。正如 Julian Young 在《叔本华》这本传记中写道：“我认为善良的休谟之所以没有对其深究下去，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使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休谟只是对人性的展现进行罗列罢了。而叔本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角度天生受到



自我意识的局限，利他行为便表现出一种（尼采所谓的超人那样）超越凡人境况的感觉，这与我们惊叹于艺术天才是一个道理。这种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给予解释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跟他钟爱的英国经验主义家们分道扬镳了。不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会对这种形而上学推论有所怀疑，尤其是叔本华所说的，利他行为是一种“与其他神秘主义核心内容同根同源”的“实践神秘主义”。叔本华认为慈悲心即道德之奥秘。而斯密则可能满足于将其视为通过培养想象力和他所谓的观察人生而发展出的社会纽带。正如Glenn Morrow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理论》（1969年）一书中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认同斯密和休谟所谓的适合人类社会法则的同情心的话，公正旁观者这个概念作为拟人化了的同情心，很显然是与良好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的。这种天然的或理性的同情心，可以使人类在同一个社会中更好地相处；公正旁观者作为这种同情心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福祉的守护者。”斯密所谓的道德情操，是从身处于人类社会、同拥有不同背景和爱好的人相处，以及人们试图解释所处世界的过程中发源的。因此我们也想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以及别人是如何评价我们所作所为的。Bandini对垂死的Sammy施以的同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俩其实同在一个大舞台上，同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正如叔本华尖锐地指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绅士化的道德体系，道德的基础并不仅仅是这种由于自己身处社会才故作的绅士风度。Bandini真的是因为突然领悟到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才表现出了自己崇高的那一面。

斯密和叔本华都赞赏艺术家们拥有的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生活中的特殊能力，也许关于这种道德立场最好的表达莫过于斯密的苏格兰老乡，诗人罗伯特•彭斯了。Ian Simpson Ross在斯密的传记《亚当•斯密的一生》（1995年）中表示，彭斯曾读过《道德情操论》：“罗伯特•彭斯在1783年的时候应该读过斯密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因此他在苏格兰某教会看到一只趴在时髦女士软帽上的虱子才会引发如此的思考”：

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

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

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

也不会胡思乱猜，

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

甚至受到膜拜！

《致虱子》（摘自《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也许 Bandini 正要寄信的那一瞬间，是因为突然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才悬崖勒马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慧眼是从何而来的？

（文章来源：译言网。译者：囧才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候选人，业余时间翻译国学、哲学类作品。囧才才系笔名。）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Jane E. Brody：同情心是天生的还是培养出来的？



Jane E. Brody，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学和营养学作家。

"

照顾者可以帮助孩子理解其它人是如何感受的，比如，当一个孩子的玩具破了，或者被其它小孩抢走了。当孩子对其它人有友善的举动时，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学家Marjorie Taylor建议，说“你那样做非常友善”或者“做那么好心的事情你很友善”之类的话，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同情心。

"

我的孙子Chasen在参加优等生的公车旅行的时候，有个男同学晕车吐了。其它的同学全都离他远远的，窃窃私语着“真恶心”这样的话。Chasen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还好吧？”事后，他们的老师表扬了Chasen，因为他对于不舒服的同学表示了关心。老师当然表扬得对，作为奶奶，我深感自豪。同情心，就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知道他人的感受，并且对此做出反应，这样的能力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如果没有同情心，人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会顾及他人的状况和感受。同情心的缺失会滋生出反社会行为，冷血的谋杀，甚至屠杀。

同情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在其它种族的生物里也有存在——如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 和 Susan McCarthy在《大象哭了》(‘When ElephantsWeep’，Delacorte Press，1995)里所说的，成年大象会去救陷在泥潭里的小犀牛，而不顾犀牛妈妈的攻击。



同情心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能表现出来，比如说，幼儿会把他喜欢的玩具或者毯子拿给另一个受伤的或者不开心的小朋友。一些专家认为，婴儿听到其它宝宝哭的时候，也会哭或者哇哇乱叫，这就是同情心的最初表现。

由于大脑的神经连接不一样，孩子们所具有的同情心能力是不一样。患有诸如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的人是不具有任何或者只有一部分同情心的，因为在那样的病症里，人的心理关注的只是自身。

但是对其它正常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同情心是被引导还是被抑制，成长环境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健康的自尊对于同情心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任何可以让孩子自我感觉良好的事情都有助于他们认识到别人的感受，并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

早早开始

如果想让孩子和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他们自己就首先得有安全感，并且“和另一个人有安全的依恋关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一位心理学家 Carolyn Zahn-Waxler 说。如果婴幼儿自己的痛苦被忽视、鄙视，或者甚至被惩罚，那么他们就会不信任他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安全感。

Nancy Eisenberg，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赞成这样的观点。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孩子需要超越他们自己去关心其它人，那么他们需要和他们的父母或者照顾者有一种积极的、充满关爱的关系。”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儿科学临床教授 Stanley I. Greenspan 在他的书《棒孩子》(‘Great Kids’， Da Caoo, 2007)中写道：“同情心源自于被同情。”书中还说，孩子需要成人的帮助去认识和表达他们的自己的情感。通过区分和命名自身不同的情感，孩子能更好的去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说，当孩子弄不好他的玩具车，把车扔到房间的另一头时，他的照顾者就可以说这样的话：“你觉得不开心，因为玩具车没按它应该活动的样子活动。你不喜欢它坏掉了的样子。”

Zahn-Waxler 博士说，给孩子订规矩应该是“可以帮助他们控制情绪，冷静下来，而不是更加焦躁”。她建议家长们保持冷静：“你自己的情绪越激动，孩子就更可能激动。打孩子或者对着孩子大叫，会让孩子忿怒或者恐惧，从而影响孩子关心他人的能力的培养。”

Eisenberg 博士强调，除了要避免体罚，孩子做错了事情，“决不要威胁他不被爱了”。



照顾者可以帮助孩子理解其它人是如何感受的，比如，当一个孩子的玩具破了，或者被其它小孩抢走了。当孩子对其它人有友善的举动时，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学家 Marjorie Taylor 建议，说“你那样做非常友善”或者“做那么好心的事情你很友善”之类的话，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同情心。

专家们说，很小的孩子就应该知道他们的行为对其他人会有什么影响。成人应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有些行为是伤害人的，有些行为是帮助人的，当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怎么去弥补。

Taylor 博士说，“要解释得非常详尽清楚，因为孩子还不能像成人那样自己得出结论。”她还说，看书并且讲讲故事中的人（或者动物）有什么感受，以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同情心。

例如 Marilyn Sadler 写的书《P.J.被宠坏了的小兔子》（‘P.J.the Spoiled Bunny’ Random House, 1986)就能帮助孩子理解自私、固执、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会有一些什么后果。在故事里，P.J.慢慢知道，换种行为方式可以和他们的朋友们玩得更开心。

对于年龄大一些的孩子，Greenspan 博士推荐像《杀一只仿声鸟》（‘To Kill a Mockingbird’)和《安妮•法兰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样的书。甚至电视上关于自然灾难的报道都有利于孩子同情心的培养——让孩子去想像，对于被地震或海啸摧毁了一切的人们来说，生活是什么样的。

早期开始培养同情心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专家们说，晚一点也来得及，甚至比如，情感需要在孤儿院里被忽视的孩子们。要想抚平创伤需要养父母们额外多的努力，以及无条件的爱。

树立榜样

家长和老师可以以身作则，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有同情心的行为。古语说“做我所做的”，这对于引导孩子的同情心非常重要。

Zahn-Waler 博士说，父母需要为无私、热情、关爱树立榜样。孩子需要看到你这样在做，并且你也要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孩子。

如果家长能对于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并且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尤其是当事情与自己并没有太大关系时，这样的行为有助孩子理解情绪，超越自身，怀着同情心对待他人。

在学校里，能引导同情心的老师是能够解释孩子行为背后的感受的人。最好的老师是本身就热情的，温柔亲切的，并且在纠正不良行为能保持冷静，而不是惩罚性的。



（本文选自译言网。译者章潇怡。）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朱光潜：谈恻隐之心


朱光潜：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

孟子所用的比譬极亲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接着推求原因说：“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他没有指出正面的原因，但是下结论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的意思是说恻隐之心并非起于自私的动机，人有恻隐之心只因为人是人，它是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

”

罗素在《中国问题》里讨论我们民族的性格，指出三个弱点：贪污、怯懦和残忍。他把残忍放在第一位，所说的话最足令人深省：“中国人的残忍不免打动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人道的动机使我们尽一份力量来减除 九十九份力量所做过的恶，这是他们所没有的。……我在中国时，成千成万的人在饥荒中待毙，人民为着几块钱出卖儿女，卖不出就弄死。白种人很尽了些力去赈荒，而中国人自己出的力却很少，连那很少的还是被贪污吞没。……如果一只狗被汽车压倒致重伤，过路人十个就有九个站下来笑那可怜的畜牲的哀号。一个普通中国人不会对受苦受难起同情的悲痛，实在他还像觉得它是一个颇愉快的景象。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辛亥革命前的刑律可见出他们免不掉故意虐害的冲动。”

我第一次看《中国问题》还在十几年以前，那时看到这段话心里甚不舒服；现在为大学生选英文读品，把这段话再看了一遍，心里仍是甚不舒服。我虽不是狭义的国家主义者，也觉得心里一点民族自尊心遭受打击，尤其使我怀惭的是没有办法来辩驳这段话。我们固然可以反诘罗素说：“他们西方人究竟好得几多呢？”可是他似乎预料到这一着，在上一段话终结时，他补充了一句：“话须得说清楚，故意虐害得事情各大国都在所不免，只是它



到了什么程度被我们的伪善隐瞒起来了。”他言下似有怪我们竟明目张胆地施行虐害的意味。

罗素的这番话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由中国民族性的弱点想到普遍人性的弱点。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象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洗刷净尽。小孩们大半欢喜虐害昆虫和其它小动物，踏死一堆蚂蚁，满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牺牲，似不仅限于野蛮民族。罗马人让人和兽相斗相杀，西班牙人让牛和牛相斗相杀，作为一种娱乐来看。中世纪审批异教徒所用的酷刑无奇不有。在战争中人们对于屠杀尤其狂热，杀死几百万生灵如同踏死一堆蚂蚁一样平常，报纸上轻描淡写地记一笔，造成这屠杀记录者且热烈地庆祝一场。就在和平时期，报纸上杀人、起火、翻船、离婚之类不幸的消息也给许多观众以极大的快慰。一位西方作家说过：“揭开文明人的表皮，在里皮里你会发现野蛮人。”据说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得意的消遣是捉蚊蝇摆在蛛网上看他们被吞食。近代心理学家研究变态心理所表现的种种奇怪的虐害动机如“撒地主义”（sadism），尤足令人毛骨悚然。这类事实引起一部分哲学家，如中国的荀子和英国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恶”一个结论。

有些学者对于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以性恶为最终解释而另求原因。最早的学说是自觉安全说。拉丁诗人卢克莱修说：“狂风在起波浪时，站在岸上看别人在苦难中挣扎，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就是中国成语中的“隔岸观火”。卢克莱修以为使我们愉快的并非看见别人的灾祸，而是庆幸自己的安全。霍布斯的学说也很类似。他以为别人痛苦而自己安全，就足见自己比别人高一层，心中有一种光荣之感。苏格兰派哲学家如培恩（Alexander Bain）之流以为幸灾乐祸的心理基于权力欲。能给苦痛让别人受，就足显出自己的权力。这几种学说都有一个公同点：就是都假定幸灾乐祸时有一种人我比较，比较之后见出我比人安全，比别人高一层，比别人有权力，所以高兴。

这种比较也许是有的，但是比较的结果也可以发生与幸灾乐祸相反的念头。比如我们在岸上看翻船，也可以忘却自己处在较幸运的地位，而假想自己在船上碰着那些危险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绝望、悲痛。将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变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许随人而异，而心中总不免有一点不安，一点感动和一点援助的动机。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同类情感。对于生命都想留恋和维护，凡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恻然感动，无论那生命是否属于自己。生命是整个的有机体，我们每个人是其中一肢一节，这一肢的痛痒引起那一肢的痛痒。这种痛痒相关是极原始的、自然的、普遍的。父母遇着儿女的苦痛，仿佛自身在苦痛。同类相感，不必都如此深切，却都可由此类推。这种同类的痛痒相关就是普通所谓的“同情”，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孟子所用的比譬极亲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接着推求原因说：“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



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他没有指出正面的原因，但是下结论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的意思是说恻隐之心并非起于自私的动机，人有恻隐之心只因为人是人，它是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

从此可知遇着旁人受苦难时，心中或是发生幸灾乐祸的心理，或是发生恻隐之心，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一念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动念的关头，差以毫厘便谬以千里。念头转向幸灾乐祸的一方面去，充类至尽，便欺诈凌虐，屠杀吞并，刀下不留情，睁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甚至落井下石，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冤气弥漫，黑暗无人道的场所；念头转向恻隐一方面去，充类至尽，则四海兄弟，一视同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养，幼有所归，鳏寡孤独者亦可各得其所，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场所。野蛮与文化，恶与善，祸与福，生存与死灭的歧路全在这一转念上面，所以这一转念是不能苟且的。

这一转念关系如许重大，而转好转坏又全系在一个刀锋似的关头上，好转与坏转有同样的自然而容易，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紧握住这个关头。各派伦理思想尽管在侧轻侧重上有差别，各派宗教尽管在信条仪式上互相悬殊，都着重一个基本德行。孔孟所谓“仁”，释氏所谓“慈悲”，耶稣所谓“爱”，都全从人类固有的一点恻隐之心出发。他们都看出在临到同类受苦受难的关头上，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丢开那一点恻隐之心不去培养，一切道德都无基础，人类社会无法维持，而人也就丧失其所以为人的本性。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平凡而亦极伟大的发见，一切伦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于这点发见。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类文化的泉源。

如果幸灾乐祸的心理起于人我的比较，恻隐之心更是如此，虽然这种比较不必尽浮到意识里面来。儒家所谓“推己及物”，“举斯心加诸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指这种比较。所以“仁”与“恕”是一贯的，不能“恕”决不能“仁”。“恕”须假定知己知彼，假定对于人性的了解。小孩虐待弱小动物，说他们残酷，不如说他们无知，他们根本没有动物能痛苦的观念。许多成人残酷，也大半由于感觉迟钝，想象平凡，心眼窄所以心肠硬。这固然要归咎于天性薄，风俗习惯的濡染和教育的熏陶也有关系。函人惟恐伤人，矢人惟恐不伤人，职业习惯的影响于此可见。希腊盛行奴隶制度，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都不以为非；在战争的狂热中，耶稣教徒祷祝上帝歼灭同奉耶教导敌国，风气的影响于此可见。善人为邦百年，才可以胜残去杀。习惯与风俗既成，要很大的教育力量，才可挽回转来。在近代生活竞争剧烈，战争为解决纠纷要径，而道德与宗教的势力日就衰颓的情况之下，恻隐之心被摧残比被培养的机会较多。人们如果不反省痛改，人类前途将日趋于黑暗，这是一个极可危惧的现象。



凡是事实，无论它如何不合理，往往都有一套理论替它辩护。有战争屠杀就有辩护战争屠杀的哲学。恻隐之心本是人道基本，在事实上摧残它的人固然很多，在理论上攻击它的人亦复不少。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攻击戏剧，就因为它能引起哀怜的情绪，他以为对人起哀怜，就会对自己起哀怜，对自己起哀怜，就是缺乏丈夫气，容易流于怯懦和感伤。近代德国一派唯我主义的哲学家如斯蒂纳（Sterner）、尼采之流，更明目张胆地主张人应尽量扩张权力欲，专为自己不为旁人，恻隐仁慈只是弱者的德操。弱者应该灭亡，而且我们应促成他们灭亡。尼采痛恨无政府主义者和耶稣教徒，说他们都迷信恻隐仁慈，力求妨碍个人的进展。这种超人主义酿成近代德国的武力主义。在崇拜武力侵略者的心目中，恻隐之心只是妇人之仁，有了它心肠就会软弱，对弱者与不康健者（兼指物质的与精神的）持姑息态度，做不出英雄事业来。哲学上的超人主义在科学上的进化主义又得一个有力的助手。在达尔文一派生物学家看，这世界只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战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就是这战场中的公理。这种物竞说充类至尽，自然也就不能容许恻隐之心的存在。因为生存需要斗争，而斗争即须拼到你死我活，能够叫旁人死而自己活着的就是“最适者”。老弱孤寡疲癃残疾以及其他一切灾祸的牺牲者照理应归淘汰。向他们表示同情，援助他们，便是让最不适者生存，违反自然的铁律。

恻隐之心还另有一点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它的最高度的发展是悲天悯人，对象不仅是某人某物，而是全体有生之伦。生命中苦痛多于快乐，罪恶多于善行，祸多于福，事实常追不上理想。这是事实，而这事实在一般敏感者的心中所生的反响是根本对于人生的悲悯。悲悯理应引起救济的动机，而事实上人力不尽能战胜自然，已成的可悲悯的局面不易一手推翻，于是悲悯者变成悲剧中的主角，于失败之余，往往被逼向两种不甚康健的路上去，一是感伤愤慨，遗世绝俗，如屈原一派人；一是看空一切，徒作未来世界或另一世界的幻梦，如一般厌世出家的和尚。这两种倾向有时自然可以合流。近代许多文学作品可以见出这些倾向。比如哈代（T.Hardy）的小说，豪斯曼（A.E.Housman）的诗，都带着极深的哀怜情绪，同时也带着极浓的悲观色彩。许多人不满意于恻隐之心，也许因为它有时发生这种不康健的影响。

恻隐之心有时使人软弱怯懦，也有时使人悲观厌世。这或许都是事实。但是恻隐之心并没有产生怯懦和悲观的必然性。波斯大帝泽克西斯（Xerxes）率百万大军西征希腊，站在桥头望台上看他的军队走过赫勒斯滂海峡，回头向他的叔父说：“想到人寿短促，百年之后，这大军之中没有一个人还活着，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怜悯。”但是这一阵怜悯并没有打消他征服希腊的雄图。屠格涅夫在一首散文诗里写一只老麻雀牺牲性命去从猎犬口里救落巢的雏鸟。那首诗里充满着恻隐之心，同时也充满着极大的勇气，令人起雄伟之感。孔子说得好：“仁者必有勇。”古今伟大人物的生平大半都能证明真正敢作敢为的人往往是富于同类情感的。菩萨心肠与英雄气骨常有连带关系。最好的例是释迦。他未尝无人世空虚之



感，但不因此打消救济人类世界的热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何等的悲悯！同时，这是何等的勇气。孔子是另一个好例。他也明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之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何等的悲悯！同时，这是何等的勇气！世间勇于作淑世企图的人，无论是哲学家、宗教家或社会革命家，都有一片极深挚的悲悯心肠在驱遣他们，时时提起他们的勇气。

现在回到本文开始时所引的罗素的一段话。他说：“人道的动机使我们尽一分力量来灭除其余九十九分力量所做的过恶，这是他们（中国人）所没有的。”这话似无可辩驳。但是我以为我们缺乏恻隐之心，倒不仅在遇饥荒不赈济，穷来卖儿女作奴隶，看到颠沛无告的人掩鼻而过之类的事情，而尤在许多人看到整个社会日趋于险境，不肯做一点挽救的企图。教育家们睁着眼睛看青年堕落，政治家们睁着眼睛看社会秩序紊乱，富商大贾睁着眼睛看经济濒危，都漫不在意，仍是各谋各的安富尊荣，有心人会问：“这是什么心肝？”如果我们回答说：“这心肝缺乏恻隐。”也许有人觉得这话离题太远。其实病原全在这上面。成语中有“麻木不仁”的字样，意义极好，麻木与不仁是连带的。许多人对于社会所露的险象都太麻木，我想这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麻木，由于他们不仁（用我们的辞语来说，缺乏恻隐之心）。麻木不仁，于是一切都受支配于盲目的自私。这毛病如何救济，大是问题。说来易，做来难。一般人把一切性格上的难问题都推到教育，教育是否有这样万能，我很怀疑。但我想，大灾大乱也许可以催促一部分人的猛省，先哲伦理思想的彻底认识以及佛耶二教的基本精神的吸收，也许可造成一种力量。无论如何，在建国事业中的心理建设项下，培养恻隐之心必定是一个重要的节目。

（选自《朱光潜美的人生》一书）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编辑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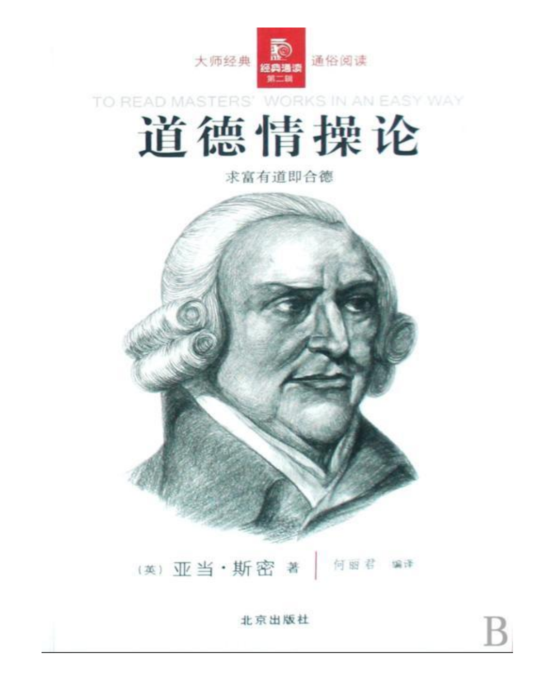
休谟《人性论》





休谟在《人性论》第二卷“论情感”中提出了同情原则。休谟认为，同情不是某种特殊的情感，而是人们观念和情感得以传导的心理学机制。这个心理机制建立在休谟印象与观念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之下。同情在休谟看来就是我们对他人情感的观念转为自身的印象的过程，也就是从“我看到你痛苦”转化为“我自己感觉到痛苦”的过程。这种心理机制是人类普遍共有的，而且它并不公正，会受到类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影响。从休谟对人类同情心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休谟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心灵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部分并不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的同情心理论同样是将同情心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其同情论乃是以“想象的立场的交换”为前提的。这就是所谓“旁观者,无论如何,首先应该总是尽可能地把他自身置于对方的立场上”。然而,因为旁观者终究无法成为受难者自身的身体,为了实现当事者的激情(passion)和旁观者的情绪(emotion)之间的感情的和谐,双方就有必要“降低激情”，从而当事人的激情和旁观者的同情共感之间可以保持某种对社会和谐来说足够的一致。这样一种人类基于自身天性的立场互换,以及由此而调整激情程度的能力，在亚当斯密看来就是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所以,斯密的同情理论本质上是立足于“旁观者优势”的市民社会的道德哲学。从同情心理论出发，亚当斯密所达到的是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机制和社会秩序形成机制的解释。



【Part 3：逐渐消失的同情？】

Kate Douglas：人类良知：善与恶的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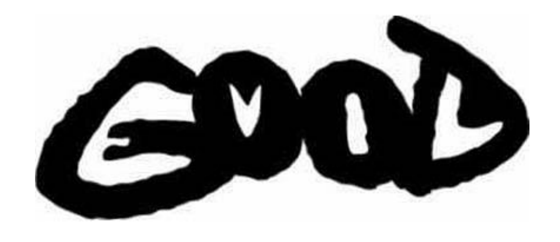
Kate Douglas：“新科学家”专题编辑。

“

这里我们要谈到良知——不是宗教意义上那种深奥的存在，而是一种进化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风险计算器，帮助我们权衡不同道德选择的利弊。其工作机制是这样的：我们熟知自身文明中的复杂社会准则，并且在脑海中将其与骄傲自豪、羞耻内疚这些情绪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以道德意义。

”

难道促使我们善恶两性进化的是同一种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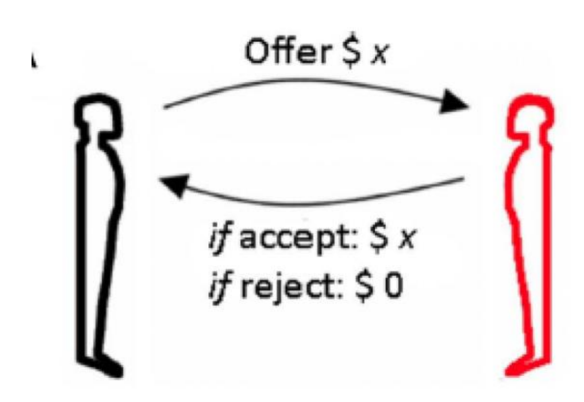
几年前，我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参加了一个关于动物行为的研讨会。会末，主办方邀请我们去动物园参观。当我们漫步在被困的野兽之间时，组织者举行了一个奇特的投票活动——哪种动物至善，哪种动物极恶？如你所料提名结果五花八门，但出乎意料，有一种动物的票数脱颖而出——智人(译者注：*Homo sapiens*，智人，现代人的学名)。更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同时夺下了至善和极恶的“桂冠”。甚至有一些人将两张选票同时投给了人类。

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智人是最卑劣又最高贵的动物。我们是可怕、残忍、腐败、贪婪的物种；我们屠杀种族、制造战争。同时我们也体贴、善良、公正且仁爱，胜过其他一切生物。这种双重本性的背后是什么呢？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霍布斯，哲学家们从未停止对于人类善与恶的思考，但现在通过对于进化论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得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想法。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利他主义何以发展？人类道德是怎样出现的？为何行善令人愉悦？是什么导致偏见和仇恨产生？这些见解的潜在力量耐人寻味。通过探究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培养出有道德感的人而非恶人，我们就能创造一个能推动我们向好的一面发展的社会。这可不是白日梦，一些进化论者已经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

道德的关键是利他主义。若给予足够的激励，任何人都可以做善事。但有一些善行背后，是真正无私的品质，这是在大自然中难得一见的现象。尽管像蜜蜂、蚂蚁这样的群居昆虫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但由于个体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帮助别的个体同样是种利己行为，至少在进化过程中是这样的，他们的基因因此得以延续。同样，我们可以解释鸟类或者其他一些动物为什么会协助同类抚养后代。对种族外的慷慨行为那是更罕见的。即便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近亲——黑猩猩，本性也是自私的，尽管它们在一项实验中表现出了少量像人类孩子一样的利他行为，例如费些力气将物体递给一只陌生的黑猩猩 (PLOS Biology, vol 5, p184)。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种我们对其有着偏见的动物——吸血蝙蝠——罕见地真正打破了这个规则，栖息在一起的吸血蝙蝠会互相分享它们的血餐(Nature,vol 308, p181)。





【图：最后通牒游戏】

然而，人类确实会表现出无私。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行为经济学家开始通过博弈来评估我们的利他主义倾向。首先是“最后通牒博弈”。参与者 A 得到一笔钱，并且被要求将钱分给一个匿名的参与者 B。如果 B 接受 A 提出的分配方案，那么两人可以按分配获得这笔钱，如果 B 不接受，那么两人将什么也得不到。理论上说，B 会接受 A 给出的任何数额，而 A 会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但在实际实验中，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实验室得到的结果中，最常见的分配金额是总额的 50%，平均也在 45%左右。甚至在这个实验的改良版 “独裁者博弈”中，A 只能选择给 B50%或 10%的金额，B 无权拒绝，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做出更慷慨的选择。这两个实验说明人类还是相当善良的（行为上不太符合逻辑）。

但我们真的是这样吗？虽然慷慨在实验室的理想环境中大为体现，但经验说明，在现实世界的压力下，人们表现得多少有些不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体现美德的证据，在出了实验室的环境后，不再那么有说服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提供给一些体育卡收藏家一定金钱，让他们从卡片经销商手中购买价值这个金额的最好的卡。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李斯特发现，若经销商被告知交易可能被监督，交易相对公平；但当经销商不知道自己在参加实验时，很多选择了欺骗消费者。而且在经销商远离他们的常客和固定经营范围时，他们的欺骗会出现得更频繁(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4, p1)。

为何高尚？

认为人类是极恶动物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只有在被监督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善良，根本不存在利他主义。另一个解释是我们只需重新定义生物学上的美德。毕竟，利他行为



对行为者并非毫无益处，否则从一开始它就不会存在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根据这一原则，进化生物学家提出了多种对人类善行的解释。

第一个可能性相当令人沮丧。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译者注：指仅仅以采集和渔猎为谋生手段的原始部落人〕倾向于与有紧密关系的人组成部落，其中包括四分之一的近亲(Science, vol 331, p1286）。帮助近亲的个体最后可以传递更多的基因，包括那些推动我们去帮助我们血亲的基因。因此，就像蜂巢中的蜜蜂，我们进化出了强烈的裙带本能（译注：无视功绩过失对亲人的偏袒，Nepotistic）。基于这个说法，对非亲属的关心，不过是物资过剩罢了。

然而，帮助他人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所以进化理应选择少犯这样代价昂贵的错误的人，除非慷慨带来的好处大于付出的代价。互惠即是这样一种人类高尚的原因。这样也能解释吸血蝙蝠的利他行为：它们一连几晚不吸血就会死亡，而寻找一个也懂得分享的同伴分享有限的食物不失为度过这种艰难时期的良策。人类群居且相互依存，总能记得谁欠自己一个人情，所以人类完全具备受益于互惠利他主义的条件。实际上这也解释了李斯特的体育卡经销商为什么会在有回头客的固定经营场所更守诚信。

当我们考虑外界评价时要担心的可不仅仅是与我们熟悉的人。人类爱管闲事的程度非同一般：我们无比热衷于观看周围人的行为，并且到处发表看法。名声即是被这么建立和破坏的——这便是声誉问题。慷慨、公正和尽责这样的品质通常会获得很高的评价，人们知道表现出这类品质能获得嘉奖——他人的喜爱，更多的交易机会，异性的示好。因而好名声能增加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根据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克里斯多夫·贝姆做出的结论，在进化过程中流言蜚语会迫使我们变得更利他——尽管是以生物学上利己的方式。



除了能为个体带来利益，利他主义也能决定群体竞争资源的方式。团结的群体会战胜那些个体成员更加自私的群体，存活下去。哈佛大学的爱德·欧·威尔逊说：“‘群体选择’是个带有争议的学说，但现在正作为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所以结果是我们比黑猩猩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即使这样，我们利己主义的倾向仍然远胜于利他主义——毕竟，天助自助者（这里，“天”不是上帝，而是自然选择）。实际上，通过变得更加利他，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让自私的人也能享受合作生活的环境——无论是分享猛犸的肉还是公平的银行系统——不用任何付出。当然，如果每个人都不劳而获，合作集体就没法形成了。这就是拥有双重性的自然所创造的两难困境，好在人类逐渐采取了一些策略来阻止某些个体的搭便车行为（译者注：free riders，搭便车——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

一是我们似乎与生俱来的喜欢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人们为看到吝啬鬼遭殃往往会拒绝同伴的低额分配，即使两个人都会分文不得。在这个博弈的另一个版本里，人们甚至愿意付钱让自私的人为他们的吝啬受到惩罚。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会使用流言、责难、排斥来惩罚轻微的行为不端；通过警察、法院、监狱来遏制更为严重的犯罪。尽管我们的史前祖先没有设立机构来执行他们的社会规则，但是贝姆认为他们使用了死刑作为最终的制裁手段来抑制搭便车行为，他发现很多现代的采猎社会都设有死刑。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惩罚确实把一些最为反社会的基因剔除出了人类基因库。

对惩罚的恐惧并不是唯一使我们警戒内心自我主义的因素。通常我们行善仅仅因为这么做感觉上是正确的。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研究所的赫布·金迪斯说：“你与他人合作是因为这是一件好事。” 赫布·金蒂斯将其称为“强互惠”，因为这种行为虽然对单个个体没有好处，但如果所有个体都这么做的话，于整个社会有益——例如选举及捐赠。金迪斯认为这种强烈的驱动力存于每一个道德行为中。这种驱动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里我们要谈到良知——不是宗教意义上那种深奥的存在，而是一种进化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风险计算器，帮助我们权衡不同道德选择的利弊。其工作机制是这样的：我们熟知自身文明中的复杂社会准则，并且在脑海中将其与骄傲自豪、羞耻内疚这些情绪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以道德意义。我们以此来衡量道德判断，对美德的偏好会打破平衡；恶行也许是你最想做的，但它与关联负面情绪上了，相反，美德被关联了正面情绪。

我们从行善中得到的愉悦实际上来源于神经分泌的一系列物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催产素，它通常与一些令人感觉良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定而亲密的关系。十年前，美国加州克莱蒙研究大学的保罗·扎克发现了催产素和道德之间的联系。他的实验表明，相比其他物质，后叶催产素分泌更多的人更加慷慨体贴，并且当他人对我们表示信任时，我们的后叶催产素水平也会随之增长。扎克将后叶催产素形容为“道德行为的钥匙”。

熊妈妈效应



这样看来我们体内存在一套神经生物学机制使我们更关心他人的利益。这种机制减少了我们的自私，却同时事与愿违地引发了我们某些极其恶劣的行为。原因是造福自身集体行为的另一面是对其他集体的敌视。这种仇外亦是由后叶催产素控制的(Science, vol 328, p 1408)，并且可被称作“熊妈妈效应”，因为它反映了母亲保护后代不受威胁的冲动。因而正是这种集体内的利他行为推动了种族歧视、种族灭绝、战争之类的种种暴行。

良知进化的结果之一，即我们所谓的“善”与“恶”概念的形成，皆是基于我们所在社会的价值观而存在的，不具有普遍性。以公平为例，在现代西方文明里，我们提倡平等——我一个，你一个——但在其他文化里未必如此。研究人员将最后通牒博弈放到 15 种不同的传统社会环境中去实验，发现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博弈中的表现有明显差异，参加者 A 提议分给 B 的金额少至 15%，多至 58% (New Scientist, 10 March 2001, p38)。

人们对不同文化价值的适应，使道德成为了一种可变的标准。我们都处于多重文化背景下——从我们最亲近的家庭到整个国家——所以我们个人的道德准则并不是固定的。毫无疑问，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行善，但在充满欺凌、腐败、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有害环境中，谁都能变成恶魔。有利的一面是，反之亦然：好的文化背景可以放大我们心中的善良。虽然这看上去不像一个革命性的见解，但有些人相信它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或许纽约州宾厄姆顿大学的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可以被认为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个。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他的家乡研究我们前面讨论的道德演变。同其它任何城市一样，在宾厄姆顿，有一些街区反社会行为盛行，而另一些街区的人们则积极地互相帮助。他标出了市内表现出亲社会性最强和最弱的地段，然后发现当人们更换了居住环境之后，就会为街坊邻居的行为习惯所同化，以适应当地文化。如你所料，这揭示了影响我们道德行为的关键因素。“人们也许是亲社会的，但是在周围人都反社会的环境中，他们做不到，”威尔逊说，他的结论是激进的，“试图增加个体的利他行为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提高整个街区的亲社会性。”

这正是威尔逊试图做的事。一方面他提供给居民把当地荒地建成公园的机会。这项服务既改善了物理环境（威尔逊发现物理环境对道德行为有很强的影响力），又可通过提供共同目标建立起合作的社区群体。另一方面，他通过实行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组内合作法则，令课堂更具合作性，吸引表现不佳的学生。此外，威尔逊还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进化智囊团，进化研究所（the Evolution Institute），将他们的想法传达给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

进化的观点同时强调了其他措施在增进道德文明中的重要性。措施之一是提高行为的透明度。因为我们知道，为了提高声誉，我们会在被监督的情况下做出最好的表现。此外，法



治也是极为重要的，包括对违法者进行迅速而公正的惩罚 (New Scientist, 5 November2011, p42)。经济发展是一项比较不受关注的措施，但前文提到的对 15 种传统社会环境进行的研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金迪斯说：“现代市场经济提倡自由、尊严、宽容和民主。”全球化也为增进道德文明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更广的社交和信息网络意味着群体间的障壁被逐渐消除，从而减少我们的排外倾向。

看看进化理论能将我们变得多好会是件有意思的事。毫无疑问，我们最糟糕的一面会继续存在。进化将使我们既利他又自私——善恶并存——谁也不能例外。爱德华·欧·威尔逊说：“唯有利他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德是进化的唯一结果，我们将成为天使般的机器人。”

我好，大家好

2009 年，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译者注：公共选择学派 Public choice theory 创始人之一）因其对“公地悲剧”困境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研究着力于探寻一群人如何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公平和可持续地分享公共资源的过程。她提出的协作规则表明，进化使我们同时具有自私和利他的两面性，且这种规则使我们能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保持一致。这对任何一个目标一致的团体的顺利运行，无论是学校、社区，还是政府、工作场所和家庭，都具有重要意义。

- 群体和目标被明确定义
- 消费和收益被共同承担
- 由共识达成决定
- 对不当行为有所监督
- 处罚温和，只在必要时加刑
- 解决纠纷迅速且公平
- 群体内试行自治
- 群体间相互协调

（本文选自科学松鼠会。译者薛藤）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John Seabrook：受折磨的灵魂：他们缘何天生“冷血”


John Seabrook：科技行业和流行文化记者。

“冷血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有吸引力、聪明、不可靠、不诚实、不负责任、自我中心、情绪浅薄、缺乏移情能力、缺乏洞察力等。“除了非常浅层次的美丑观念之外，善、恶、爱、荣誉、幽默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打动他们。”

美国西新墨西哥州监狱位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市西部约 70 英里远的内陆沙漠地区，监狱不远处的格兰茨曾是一个依赖服刑人员开采铀矿的新兴城市。

监狱塔楼的顶部是一个玻璃房间，装着百叶窗，天花板处的曲柄把手可以控制探照灯。地板上的盒子里有一些催泪弹，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催泪弹马上就能派上用场。

塔楼下方监狱裙楼是座六面体建筑，周围以高耸的铁丝网隔离，铁丝网顶端的锋利金属丝在沙漠日头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光。监狱东面的 Mt. Taylor 终年被积雪覆盖，是附近一带的最高峰。往西面极目远眺能看到 Zuni 山脉。

去年 4 月份某天清晨，Kent Kiehl 医生大步穿过监狱停车场入口，他边走边说：“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到达大门口，整个监狱的人都会知道，我来了。”这位犯人们口中的“大夫”那天穿蓝色外套，系黄色领带。他个子很高，宽肩膀、身板结实，褐色头发梳得很整齐。比起“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头衔，他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学足球运动员。

不过他只要一开口，就立刻又变成了学校里博学的好学生，他嗓音极尖，那无所不知的学识和那粗犷的说话方式一定会让你震惊。



年仅 38 岁的 Kiehl 已然是全球精神疾病研究领域中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一种被称为 psychopathy 的“冷血症”。北美监狱中有 15%至 25%的犯人患有这种精神疾病，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全人类成年男性中有 1%患有此病（女性患者的比例则小得多）。

“冷血症”患者们不会像其他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那样表现出狂热、歇斯底里或焦灼紧张的情绪，他们最主要的特征是完全缺乏共情能力（empathy）和悔恨心，心理学家称之为“严重情绪冷漠”。比起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它更为隐蔽，也更难描述。由于冷血症缺乏易于解读的症状，在精神健康领域的从业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其诊断标准和诊断方法的辩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没有将“冷血症”明确定义；却用 A.P.D“反社会性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一宽泛的术语将之涵盖。

目前，专家们对“冷血症”的形成原因几乎没有达到什么共识。包括大范围双胞胎研究在内的大量证据显示，遗传组成(genetic component)扮演了一定角色。然而缺乏关爱的家庭比那些充满亲情、教育良好的家庭更易引发“冷血症”。

“冷血症”可以像血压那样被用数字来衡量；也可以像白血病一样被分类。研究人员们争论的焦点是，测量方法是应该集中在被试的具体行为上，还是应该包含对被试人格特征的分析，例如欺骗、油滑和不知内疚等。唯一令每位研究者都同意的是，“冷血症”很难治疗。

对某些研究人员来说，“冷血症”这个词与犯罪行为和大众文化形成了长久和负面的关系：开始是改编自真实犯罪事件的纸张小说，发展到现今如 CBS“犯罪心理”的电视节目，还有 Thomas Harris（《沉默的羔羊》作者）和 Patricia Cornwell（以一系列法医探案小说闻名）等作家们“推波助澜”。“冷血”这个词饱含了负面、恶毒元素，使得与此有关的文学作品全都带上了诡异色彩。

精神健康部门对冷血症研究进展的漠视令 Kiehl 受挫，他说：“想想看，犯罪引发的经济损失每年都是天文数字，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四十岁前平均因四起犯罪行为而获罪，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将冷血症划入科研范畴。而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投入资金则多了上百倍，其实精神分裂症引发的犯罪比例要小得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被看作受害者，而冷血症患者却被认为是施虐人。对前者，我们倾注同情心；而对后者，我们却将他们锁起来。”



2007年1月，Kiehl把便携式fMRI（功能磁共振扫描仪）带进了监狱——这可是第一个安装在监狱里的fMRI。目前为止，他已经在监狱内招募到好几百名志愿者加入研究工作。

Kiehl希望扫描得出的数据能证实他06年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期刊上发表的理论，他认为引发冷血症根本原因是脑内“旁边缘系统”（paralimbic system）的受损或缺失。“旁边缘系统”是一个大脑区域网络，自眶额叶一直延伸到后扣带回皮质，这个系统与人类的感情处理、抑制作用以及注意控制有关。

Kiehl梦想着有一天能扭转大众对冷血症患者的态度并且最终找到治疗的方法：“假如你能将相关脑区域准确定位，那么就或许能找到治疗那个区域的药物；即使你只治疗了那个区域中百分之五的毛病，诺贝尔奖也是囊中之物。”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关押了406名犯人，他们的服刑时间少则一年，多则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新墨西哥州使用数字1至6的编排方式来标明犯人们的暴力程度（6指代暴力程度最高），Kiehl工作的监狱内的犯人们暴力指数涵盖了从1到5的范围。

尽管并非所有冷血症患者都很暴力，但大部分人的暴力指数被编为4、5、6。不像许多学院派的冷血症研究者，Kiehl花很长时间同他的被试共处。他告诉我：“在会议中遇到同事们时，他们总喜欢问我‘冷血症患者看起来怎样？’这群人花费二十年研究冷血症，却从来没见过哪怕一个病人。”

比起监狱里冷血症患者的人数，散落在社会群体中的患者数字要庞大得多，假如1%的概率正确的话，仅美国就有一百多万“冷血动物”。一旦脱离监狱环境，这种病症在社会上就更加难以被发现或确认。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十分成功的“社会精英”，有着体面出色的工作，在各个领域大展拳脚。除非触犯了法律或者被犯罪行为评定系统给盯上，否则他们压根就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的典狱长Anthony Romero在会议室向Kiehl展示了几样从犯人那儿没收的东西，有手工制的剃刀和简陋的纹身所用器械等等。

典狱长Romero解释说，Kiehl不仅用扫描仪研究冷血症，同时也衡量滥用药物者在治疗过程中大脑的依赖程度变化，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出资、Kiehl主持的。

犯人中的志愿者人数超过了 90%(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块头太大而找不到适合的扫描舱)，作为一项“附属福利”，Kiehl为志愿者们提供脑部临床检查（他在5%的志愿者脑部找到了之前未被发现的肿瘤）。



Kiehl 以志愿者们脑部影像照片作为占用他们时间的报酬（西墨西哥州监狱规定监狱劳动力报酬为每小时 1 美元），犯人们还可以把脑部扫描成像张贴在自己牢房里。典狱长 Romero 说“犯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谁的脑子最大的笑话”。

扫描仪封装在一辆牵引式挂车里，车子停在服刑犯资料中心库房的后面。我们一行人跟随教官穿过庭院来到供犯人改造用的侧楼，侧楼中间有一大片公共区域，四周围绕着一圈双人牢房。

犯人们都在自己牢房门口肃立，有些人手上还拿着拖把和扫帚。我走进一间空着的牢房，一眼就看到在这间牢房服刑人员的脑部扫描成像，已经卷了边的扫描图上显示着黑白双色的粗糙图像，被钉在书桌上方。

随后我们走过牢房通道，从另一头的门出去，其间经过的一副巨大的海报，上面的一行字被划了线：“我在这儿是因为我无力给自己提供庇护。”教官带领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参观，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除了用来接待 Kiehl 在新墨西哥州大学的学生们探访精神疾病患者之外，也被用作“药物滥用”研究项目的会议室商讨工作。Carla Harenski 是由 Kiehl 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她曾在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接待过一名犯人，那位犯人身型魁梧，脖子上留着刺青。同所有研究人员的办公室一样，Carla 的那间办公室也装着防止犯人突然发动攻击的求救按钮。

为了区分出监狱志愿者中间究竟哪些人患有冷血症，Kiehl 和他的学生使用了一套修订版的“冷血症症状量表”（PCL-R）。该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是加拿大心理学家 Robert Hare 根据其常年在狱中对冷血症犯人们所作的研究而设计的。

Robert Hare 是 Kiehl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正是他本人亲自教授 Kiehl 如何使用这套量表。研究者们通常会与犯人面谈三个多小时，然后将犯人的记录和个人历史与他的陈述进行对比。

研究人员会依次对照 20 个项目为研究对象“评分”，比如寄生状态，病理性谎言，欺诈行为，无聊倾向，情绪浅薄，移情缺乏，冲动控制障碍，放荡行为，无责任感，青少年犯罪记录和犯罪类型多样化，以及其他一些行为趋势，并根据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特征明显程度用数字 0、1、2 来标注。

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同意，测试对象的评分若大等于 30 分就被看作是患上了冷血症。Kiehl 说：“有的人得分 35 或 36，他们明显异于常人。这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哈，逮住你了，你就是我做这些工作的原因。’”



最近 Harenski 与一名评分高达 38.9 的犯人进行了谈话：“他杀了他的女朋友，因为怀疑自己被欺骗了。” Harenski 告诉我们说：″这个犯人描述犯罪过程的方式如此令人着迷，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哪怕当他讲到一些恶心的事情。”

心理学家 Reid 和 M. J. Meloy 组织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精神健康及刑事犯罪方面的专业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曾在与冷血症患者面谈时产生不由自主的恐惧感。两位 Meloy 认为，这种反应可能源于古老的物种间猎食反应系统（intraspecies predator-response system）。然而现年 30 岁的 Harenski 却不在恐惧者之列。他补充道：“我只是觉得兴奋。我对自己说‘哇，我逮到一头真正的冷血动物’。”

大厅尽头有一扇门通向挂车停放的地方，挂车内部有一片小的休息区可以落座，电脑显示器和硬盘驱动器安装在中间的操纵台上，fMRI 扫描舱位于挂车尾部，扫描舱表面盖着白色模制塑料。

Keith 是 Harenski 的丈夫，在 Kiehl 的实验室担任 MRI 主技师，负责在研究过程中操纵扫描仪。通过电脑屏幕能看到被试脑部的扫描状态，志愿者们躺在那儿，旁人只能看到他套着脏兮兮袜子的脚从扫描舱里伸出来。

Kiehl 和他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经设计出了两套测试题，或者称之为“任务”，两套测试分别建立在“字本位”和“图本位”的基础上。Kiehl 说他已经尽量避开设置复杂的道德问题，比如用经典的“电车困境”（译者注：trolley dilemma：一辆行驶的有轨电车奔向 5 个人，如果按目前的状况继续行驶的话，这 5 个人都会被撞死。拯救这 5 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扳动道岔，使该电车被切换到另一副轨道上去，这样的话只会撞死 1 个人而不是原来的 5 个人。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这样做，即牺牲 1 个人而救 5 个人。）问题去拷问志愿者，是否会选择为了救 5 个人而牺牲 1 个人的性命。冷血症患者很难理解这类问题的用意，即使理解了，也可能不会认真作答。

“要尽量降低志愿者和你‘捣浆糊’的可能性。”Kiehl 说，“同时让对照组完成同样的任务，对照组包括一名没有患上冷血症的犯人，和另一名并非来自监狱、但在智力和教育背景上与犯人们相似的个体，然后，‘字本位’测试就可以开始了。研究者们向犯人志愿者展示一系列词汇和短语，并让他们评定这些词语是否违反道德。短语一般有三种类别：第一种是相当于“和你的母亲发生性关系”之类明显违反道德的字句；第二种则是类似于“堕胎”这样模棱两可的短语；还有一种就很中性化了，比如“听取他人意见”。

电脑软件不仅捕捉犯人志愿者的回答，同时也对他们做出选择所花的时间进行计时。成像技术还会捕获脑中负责做决定的区域，并记录该区域神经元在测试过程中的活跃程度。



脑中的神经元在“发放”时会消耗氧气，血液里含铁元素的血红蛋白细胞则会补充氧气。当成像技术捕捉大脑横截面非常微小且飞速运动的一系列"脑薄片"时，扫描仪的磁体就会把血红蛋白里的铁分子临时调整排列。磁体具有超导性质，这意味着其工作温度非常之低（零下 269 摄氏度）。

这台机器装有液氦冷却系统，不过万一系统故障，磁体就会“失超”。“失超”是每一个 MRI 技师的噩梦：买一个新的磁体得花费两百多万美元！

测试的时候志愿者戴上一个缠绕着线圈的头盔以收集磁数据，头盔里面的投影设备向志愿者展示测试用的词汇。另外还有一个通过志愿者的手汗测量“皮肤电传导”的传感器。

在扫描仪绘制功能性成像时，机器会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哔哔”声，并以一声响亮的钻孔声结尾。而到脑部剖析扫描的时候，机器又会发出低沉、快速的打击音，像是有颗金属的心脏在跳动。志愿者在此过程中交叉了一下两只脚踝，然后分开，又动了动他的脚趾头。

冷血症可以追溯到《圣经》里杀害亲弟弟的人物——该隐，尽管这类人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中更为普遍，但他们其实在所有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尤皮克爱斯基摩人（Yupik Eskimos）有一个专门的词——kunlangeta 来形容那些说谎不打草稿、喜欢欺骗、偷窃并且擅长诱拐女人上床的“高手”们，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 Jane M. Murphy 于 1976 年对此做过研究。她问一名爱斯基摩人，群体成员一般会怎样对待 kunlangeta。那名爱斯基摩人答道：“趁别人不注意，有的人会把他从冰面上推下去。”

法国外科医生 Philippe Pinel 在 1801 年首次把此种病症引入临床医学范围，他称之为“非谵妄性躁狂症”（mania without delirium）。19 世纪早期，美国外科医生 Benjamin Rush 记录过一种“道德感紊乱”的情形，患者既没有妄想症也没有精神病，然而他们深深沉浸于反社会行为无法自拔，并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Rush 注意到，这种情形会在患者生命早期就开始呈现。

“悖德狂”（moral insanity）这个术语在 19 世纪中期流行开来，并曾在美国和英格兰广泛地用于称呼那些无可救药的犯罪分子。“冷血症”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受折磨的灵魂"）1880 产生于德国。1920 年代的精神病医生们则给那些他们无计可施的、缺乏良知感、暴力且反社会的罪犯们按了个统一的名称——“构成性冷血低劣症”（constitutional psychopathic inferiority）。

1930 年代末期，美国精神病医生 Hervey Cleckley 开始收集他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工作时诊治的某一类病人的数据。这些病人来自不同的社会和家庭背景，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却来自当地声名显赫的家族。Cleckley 想要为原先模糊的“构成性冷血低劣症”找到精确定义，并将这种病状与其它精神疾病区分开来。



他最终分离出了 16 条被他称为“主要”冷血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有吸引力、聪明、不可靠、不诚实、不负责任、自我中心、情绪浅薄、缺乏移情能力、缺乏洞察力等。“除了非常浅层次的美丑观念之外，善、恶、爱、荣誉、幽默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打动他们。”Cleckley 在其 1941 年所著的《神志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中这样形容了冷血者，他的这本著作已经成了这门现代科学的基础。Cleckley 解释说：“尽管他们谈吐风趣，举止聪明迷人，但他们手里都拽着等你上钩的诱饵。”

Cleckley 强调了他的研究对象们虚伪、掠夺的天性，说这些高度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完美地伪装成情感正常、高智商以及有社会责任感”的“冷血动物”。这种伪装在现实社会中不仅能蒙混过关，甚至可说是天衣无缝。Cleckley 强调，他们自私的行为同时也是拜“胜者为王”式美国文化的熏陶。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精神病学专家都不想和“冷血症”扯上关系：首先，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在好些研究报告中都显示谈话治疗根本不起作用，甚至反而让情况更糟糕，因为谈话会让这些病人学会应对周旋的技巧。

目前还没有任何手段能清楚地衡量与这些症状有关的人格特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只能根据犯罪纪录来评估对方的行为是否符合“冷血症”症状。

最后，“冷血症”这个词的着眼点是个体内部的病变，这有悖于二十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思潮，即认为社会偏差应该从外部寻找原因。1930 年，由心理学家 G. E. Partridge 创造的新词“社会病态”开始流传开来。1958 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精神蟑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用“社会病态人格”（sociopathic personality）来形容这类症状；1968 年又把这种病症更名为“一般性反社会人格障碍”（general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Cleckley 的书最终失去了市场，晚年时的他形容自己好像“旷野中的哭喊”。他死于 1984 年，后世的人们记得他，多半是因为他与 Corbett Thigpen 合著的描写多重人格症的《三面夏娃》一书。

1960 年，Robert Hare 接手了一项工作：在温哥华市外 20 英里远处的一间重兵把守的监狱担任驻守心理医生。上任第一天，就有一名深色头发、又高又瘦的犯人走进办公室说：“我说医生，工作咋样？听着，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后来 Hare 医生记录了这次会面：“他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在吡卜作响，他看我的眼神如此直接而犀利，都让我怀疑我以前是否真正地这样去看过一个人。”

Hare 问这个被他称为 Ray 的犯人遇到了怎样的问题，“犯人掏出一把刀在我鼻子前摇晃，整个过程他都微笑地看着我。” Hare 回忆道。他在 1993 年出版的《灭绝良知：我们周围



冷血症患者的纷扰世界》（Without Conscience: The Disturbing World of the Psychopaths Among Us）中提到了这件事。Ray 告诉医生，他本来打算将这把刀用在另一个犯人身上，因为后者曾向他的“被保护人”示好，在监狱的黑话中，“被保护人”指的是同性恋伴侣中被动的一方。

在 Hare 驻守监狱的八个月中,Ray 虽然从来不曾加害，却成功地操纵了他。两年半后 Hare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假释出狱的 Ray 还试图用假造的成绩单在哥大登记注册。

驻守监狱的那段日子，Hare 对冷血症的文献还不熟悉。那一年年底，Hare 举家搬到了安大略省伦敦市，在西安大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Hare 在东部旅行时，有一次下山途中刹车失灵，他回想起 Ray 曾经在监狱的修车场里动过他的车）。

Hare 的论文重点研究惩罚机制对人类学习和表现的影响，有一天在图书馆，他发现了《神智健全的面具》这本书，读了 Cleckley 所写的案例后，他把自己想像成 Ray，以及他在重兵把守的监狱里头所遇到的另几种犯人。这些人真的是冷血症患者吗？第二年开始，除了阅读 Cleckley 的著作之外，Hare 还阅读了 Cleckley 综述的早期文献。１９６３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温哥华，并且为自己制定了此生的工作目标：研究冷血症，并制定一份冷血症病状量表，这就是此后 Kiehl 用到的２０项诊断标准。

多亏了这份量表，在不同地域工作的科学家们才能自信地判定他们各自的被试可以归入相近的类型。

ＰＣＬ在法庭上也有了多种用途。整个加拿大的假释委员会在听证时都会使用 PCL，美国也在越来越倚重 PCL。在美国允许执行死刑的３７个州，检方通常会在法庭对死刑案件量刑之际上呈被告在冷血症量表上取得高分的事实，以作为量刑时的“加重因素”。

冷血症评分同样被用于儿童监护案件，被判高分也许会导致父母中的一方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眼下，Hare 在冷血症研究领域享有极高权威，他指导过的学生们已经在加拿大监狱管理系统担任重要行政职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Hare 之后两代的冷血症研究者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

Kent Kiehl 八岁的一天，他那位在《塔科马新闻论坛报》（Tacoma News Tribune）任编辑工作的父亲 Jeff，在家中谈到当地一位名叫 Ted Bundy 的人：“据说就是这个街头小混混杀了那些女人。”Bundy 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里搬到塔科马港，他因对至少 30 名女性实施性侵犯和谋杀而在 1970 年代臭名昭著，然而他的外表看起来却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人。

他曾经获得过两封对他极尽赞扬的推荐信，一封来自他曾经就读本科学位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信中形容他“非常地聪明，风度优雅，积极性高，并且为人正直”）；另一封是来自与他共事过的华盛顿共和党理事 Dan Evans。讨巧的外表，迷人风度和出色语言能



力，让 Ted Bundy 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猎手”：他于 1979 年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并获死刑，之前他在塔科马港那一带人们的心中都一直是无辜的，Bundy 在 1989 年于佛罗里达被执行死刑。

Kiehl 的父亲是个体育迷，但他长年受一种肌肉萎缩症的折磨而行动不便（Kieh22 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爸爸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能成为大学足球队一员。” Kiehl 也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在 Washington Huskies 大学 5 万名“粉丝”面前踢上一回。他后来上了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并在几千人面前踢球。他决定向医学发展并且登记成为预备医师之后，再也无法平衡学业和体育爱好之间的关系。大二时一次膝关节受伤后，Kiehl 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Kiehl 选修了一门心理语言学专家 Debra Long 教授开设心理学课程，Debra Long 同时也是他的学业导师，Kiehl 很享受他和 Long 对情绪处理和脑所做的研究。

Long 教授问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Kiehl 回忆道：“我对她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干坏事，他们怎么会变成那样的，就像 Ted Bundy。而且我也想研究脑。” Long 教授给出的建议是，Kiehl 应该把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冷血症。

Kiehl 根据他对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 485 名本科生调查所得的数据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他分发给学生们 Hare 的冷血症量表让他们填写。最后他发现，有冷血症特质的人中间，破坏性行为所占比例极高。

Kiehl 早年在冷血症领域接受训练时，正赶上功能性神经成像技术的出现，Kiehl 是个电子产品迷，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实验所需的计算机技术。最早期的技术是用来衡量事件相关电位(简称 E.R.P.)的，它可以通过使用镶嵌了电极的帽子来绘制脑部活动情况的图表。

1991 年 E.R.P.系统在温哥华监狱的使用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Robert Hare 和两名研究生向公众展示了冷血症患者与普通人之间处理“爱”“恨”之类词语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在 Bronx V.A.医学中心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Hare、Joanne Intrator 等研究人员发现，冷血症患者的脑在加工带感情色彩的词语时使用的部位与一般人都不同。

常人在处理带感情色彩的词语时，脑活动集中在中脑的边缘区域，因为那是处理情绪的中心；而“冷血症”患者们脑活动的中心却是大脑前部专司语言的部分。Hare 解释道：“看起来他们只能从语言角度来理解感情色彩词语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能理解歌词，但无法理解曲调。”自那时起，脑成像就开始主导认知神经科学，尽管它在冷血症的研究中应用得还并不广泛。迄今，冷血症的 fMRI 研究巩固了这项技术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种模型。Kiehl 曾经研究过这些理论，那时，他正在 Hare 设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一些科学家认为，冷血症患者受严重且广泛的注意力缺损之苦，因此，他们总是



会暂时忘记特定反社会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后果。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心理系主任 Joseph Newman 是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模型基于传统研究方法，如，用大脑受损的老鼠进行实验室研究，以及用著名的纸牌游戏对人类进行研究。在纸牌游戏中，玩家会逐渐开始输钱，控制组的玩家在所得减少时就会停止，而冷血症患者只关注选了下一张牌后的结果。对冷血症的另一种假设是，患者缺乏对人身伤害的恐惧，更关键的是缺乏道德恐惧感——对惩罚的恐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David Lykken 开此项研究的先河，现在已经有 James Blair, Christopher Patrick 等人领过了接力棒。这个模型的最新假设是：冷血症是杏仁核的功能障碍所致。杏仁核是位于中脑的一束杏仁状的灰质，它是负责情绪加工的一个脑区。

当 Kiehl 来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Hare 将他派往附近新开的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Kiehl 事后回忆道：“Bob 说：‘有个刚开的监狱，住着最糟糕最糟糕的囚犯——你可以在那儿工作。’于是我提交了做 E.R.P 研究的申请，见了监狱的精神病医生 Johann Brink。他说，‘我给你找了这间办公室，这是你的钥匙，那边就是囚犯了’——这就是对我的培训。他们打开门，有五十个纹着纹身的家伙看着我。第一周，我和一个连环杀手面谈。他告诉我他杀了十六个人，还描述是如何把他们切碎的——当时我就隔着桌子坐在那家伙对面。”

Kiehl 对一个在 PCL 上得了“满分四十分”的囚犯印象最深，我管那个囚犯叫 George。George 来的那天早上,Kiehl 正在监狱。经过一番处置，George 脱得一丝不挂，在倾盆大雨中走过牢房外的路。“我新来的，”他后来跟 Kiehl 解释，“我想立刻证明，我是个疯狂的混蛋，离我远点。”George 详细讲述了他罪恶的过去。他自儿时开始犯小错，十七岁被判纵火罪。九十年代早期，他因为非法入侵住宅在监狱待了十八个月，之后搬回去与他妈妈同住。一天，俩人吵架，她拿起电话呼叫警察。“伙计，你能相信吗？这婆娘居然有这胆子。”George 问 Kiehl。他用电话线缠住母亲的脖子，将她勒死。“然后我把她扔下了地下室的楼梯，但不知道她是不是死了，于是我找来把菜刀捅她，她的身体发出奇怪的声音，我猜是气体在往出蹿，但我不确定，所以我抓起一个大丙烷气罐把她的脑子砸出来了，”然后，他离开了三天。“我回来时，房子发臭——臭气熏天。”他用漂白剂清理了整个地下室，裹起他母亲的尸体，塞到她汽车的行李箱里，开进了山。

路上,一个警察拦住问他是不是喝醉了。George 说自己只是在找地方方便。警察给他指了条土路，George 就开过去把尸体留在了林子里。结果，他抛尸的地方是一片松树甲虫猖獗的山区，几天后一个林业员发现了尸体。“该死的松树虫子”George 忿忿道。一开始，警察在房子里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是 George 忘了清理溅有血迹的甲烷气罐。当他被定为误杀罪并判处终身监禁时，George 只是笑了笑。



Kiehl 本想扫描 George 的脑。但 fMRI 机器通常在医院或神经科学中心，将囚犯从牢里送到机器跟前又复杂又花钱，需要周密的安保措施保证人员安全、防止罪犯逃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Kiehl 已经因为扫描罪犯的困难和那些科学家得要处理的小数据样本屡次受挫了。“你会想有 800 个被试，而不是 8 个。”他说。在 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八年里，Kiehl 只扫了五十来个囚犯。之后在耶鲁大学作副教授的七年中，他扫描了约两百名曾是囚犯的人，不过只有一部分的 PCL 得分高。

从 1993 年开始，Kiehl 就在想补救的法子：一天在温哥华的高速公路上，他开过一辆侧边写着“移动 MRI 机”的卡车。“当时，我就想，嘿，要是在监狱有上这么一个该多好，”Kiehl 说。当时，他对搞到扫描仪需要的两三百万美元没抱什么希望。最终，2006 年，新墨西哥大学找他商量把实验室搬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的事。

Kiehl 在新墨西哥大学被任命为副教授，和阿布奎基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的主要研究者。该组织按他的要求，购买了一台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轻便式扫描仪。2007 年 1 月这部机器安装在了新墨西哥州惩治所（the Western New Mexico Correctional Facility）,在国立心理健康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资助下，Kiehl 开始了扫描。“目前，我们已经在总共一千个序列里扫描了五百多囚犯了，”他告诉我。“四个月里我扫描的精神病态者数是之前工作中总数的两倍。”

今天，Kiehl 和 Hare 有着互补但复杂的关系。Kiehl 称 Hare 为导师，还认为自己是在通过研究冷血症的神经机制对 Hare 的量表进行证实。Hare 则对把 fMRI 当诊断工具不那么热衷。“有人说，某种意义上，这是新的颅相学，”Hare 说。十九世纪，颅相学通过查看脑袋上的隆起判断人的精神特质，它早已坏了名声。“只不过这次隆起在里头罢了。”（Hare 本人是脑成像技术的“强烈支持者”，但是他提到，单靠扫描永远是不够的。）Hare 认为自己是多面手，觉得 Kiehl 更像是一个“数据控”。Hare 补充道，尽管 Kiehl 的急性子让人敬而远之，“但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做成事的原因。”

Robert Hare 蓄须、削瘦，超然的作派似猫一般。他今年七十出头，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荣誉退休。我五月份在奥巴尼的一家霍姆伍德套房（Homewood Suites）宾馆见到他，他在那里主持一个为期两天的精神病及其量表使用的研讨会。会议的发起者是纽约州心理健康局性罪犯教育与治疗办公室。（the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s Bureau of Sex Offender Education and Treatment）相当比例的性犯罪者都是冷血症患者。针对那些刑期已满但不能予以释放的性犯罪者，纽约州最近开始在精神病治疗机构中筹措一系列特殊计划。



Hare 的冷血症量表现在共有三个版本。（一个少年版，一个普通人群版——所谓“筛选版”，用来对没有症状的人进行诊断）每次使用官方 PCL 评分表，Hare 都会收取一笔版权费。整套关于冷血症的文件包中有一本跟书一样厚的使用手册，其中介绍了如何用评价量表，价值 263 美元。它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奥巴尼（Albany）举行的研讨会是 Hare 每年要主持的大约五六个会之一。下周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做关于冷血症和罪责的报告；然后去罗马执导意大利宪兵如何使用评价量表，以及如何定义冷血症患者。在奥巴尼，他的听众主要是心理学家和其他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

Hare 认为自己是在继续 Cleckley 开创的一项事业——提醒社会注意一项几乎会被继续遗忘的，具有破坏性，代价高昂的精神障碍。法庭经验让 Hare 知道，冷血症对监狱里的心理健康工作者，执法者和假释委员会都很重要。和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个体打交道的人们，需要工具去识别冷血症患者，并在他们可预期的行为基础上做出风险估计。（根据几项国内外研究，冷血症罪犯在释放后一年内重返监狱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三倍。）Mary Ellen O’Toole 是 FBI 的顶尖刑事分析员，她的工作是调查全球最极端、最暴力的犯罪事件，包括连环谋杀、连环强奸、儿童绑架、校园枪击、工作场所暴力、家庭凶杀案等极端和/或异常的暴力犯罪。她告诉我，在调查犯罪现场时，她会利用自己针对冷血症的训练——她也曾到 Hare 那里受训。她会在调查中寻找那些“符合精神病人行为的特征，比如不思悔过、寻求刺激、行为冲动等。”而调查所得的信息又能在“调查、面谈，甚至对被告的起诉”中发挥作用。

Hare 想从 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订，常用以诊断精神疾病——译者注）的整体诊断中，把冷血症从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P.D）中区分出来。“这就像肺炎跟感冒，”他说，“它们有些一致的症状，但前者更致命。” 1994 年，在 DSM 第四版出版之前，Hare 发表的几篇文章提到了一些现场研究，它们反映了冷血症和 A.P.D 的不同。精神病医生 John Gunderson 领导了人格障碍工作组对 DSM 的修改。据 Hare 回忆，John Gunderson 曾告诉自己，从理论上说，自己“赢了这仗”。尽管如此，在 DSM 第四版中，“冷血症”仅以 A.P.D 的一个同义词出现。（Gunderson 说这是机构惰性的表现。）Hare 已经在继续跟踪将于 2012 年面世的下一版的准备工作了，他近来也发电邮给工作组的一位资深成员，询问 A.P.D 有无任何修改计划。但据他说，回复中并未表态。

Hare 出过两本书，将一些冷血症的概念翻译给了普通听众，并尝试教人们如何在自己中间识别“成功的冷血症患者”。在《灭绝良知》（Without Conscience）的引言中他写道：“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你很有可能会和冷血症患者有痛苦的来往。为了你生理上，心理上和财产上的健康，知道如何辨别冷血症患者很重要。”书里写到，容易吸引冷血症患者的职业包括执法，军事，政治，和医药——尽管他强调，这些行业都是有规范和自我监督

的。冷血症患者最中意的是商业，Hare 说。在他的第二本书、与 Paul Babiack 合写的《套中蛇：当精神病态者去上班》（Snakes in Suits: When Psychopaths Go to Work）中，Hare 调侃了流行心理学，指出很多特征，像冷酷，缺乏社会良知，一心追求成功，在公司里是可取的，但之外都可能会被视作冷血症。

研讨会第一晚，Hare 和我到 Smokey Bones 吃饭。我们沿着沃尔夫路高速行驶时，前面一个交通灯变黄了。我本想干脆油门踩到底——要不是为了我的乘客的话。后来我还是放慢速度停下来。但身边的车飞速开过，闯了红灯。

“哈，瞧”Hare 说，“这么说，那男人可能是个冷血症患者。”那确实是冷血症患者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将十字路口的其他人置于危险中。

但问题是，“冷血行为”——比如自我中心，或缺乏现实的长期目标——在超过百分之一的成年男子身上都有。冷血症特征的这种模糊性会让它看起来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五十年代中期，《无因反叛：犯罪精神病态者的催眠分析》（Rebel Without a Cause: A Hypnoanalysis of a Criminal Psychopath）的作者 Robert Lindner 将少年犯罪解释为群体冷血症状爆发。Norman Mailer 在《白种黑人》（The White Negro）中却将这个说法翻转过来，将嬉皮士看作“哲学性冷血”一样来崇拜，因为他们有鹤立鸡群的勇气。六十年代，社会病态取代冷血症成为主流观点。当下，在我们这个基因决定论的年代，社会又在四处发现冷血症患者，这无疑又会刺激另一些人说，它根本不存在——过度曝光和经费不足的循环将重演。

Hare 儒雅、博学。在席间，他将自己对冷血症患者的诊断描述应用在了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上。《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由 Orson Welles 扮演的反面人物 Harry Lime 就是一例。“亚戈是个典型的冷血症患者。” Hare 补充说，“莎翁就是这么写他的。电影和戏剧中他被演的很邪恶，但莎翁不是那么写他的。”(亚戈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塞罗》中的人物－－译者注)Hare 虽友好但仍对我保持警惕——好几次他都说：“告诉你之前我必须要看你的眼睛。”我们聊起量表。“对量表的现状我开心么？”他反问道。“不，并不总是。拿它判人死刑我开心么？不，我没有。”他也不支持在子女监护权的案子中用量表。然而他相信，当在法庭上用它作出恰当的风险预测时，它的社会收益是远远超过它的缺陷的。Hare 拒绝把像 Ted Bundy（此君系著名连环杀手，绰号“漂亮诱惑”，以俊美形象吸引异性——译者注）这样的暴力冷血症患者和参与经济犯罪的非暴力冷血症患者区分开。按他的说法，两者都会不择手段。他继续说道：“你能说 Ted Bundy 比安然公司的家伙们带来了更多灾难么？（指安然公司破产造成的后果——译者注）这么多人没了积蓄，该有多少人自杀，多少声明给毁了啊？”



Hare 向我透露，在 U.B.C 执教时他发现“冷血症研究者最后可能会成为研究对象的受害者。”他讲述了刚工作时，他的一名学生是如何与一个囚犯有了性关系。监狱方在牢房中当场捉奸。和 Hare 当面对质时，那学生“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没做过’。”他回忆着。那学生是如此确凿地否认了一切，以致 Hare 开始怀疑那些他曾信以为真的事。

饭后，我们去 Hare 在宾馆的房间喝苏格兰威士忌，他给我看了他电脑上冷血症患者视频。“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的眼睛。”他说。“看他们是如何控制你的。” 我们看着“Bruce”，一个长发、牙齿参差的四十岁男人，描述他是如何在小时候谋杀了他的兄弟。他嘴旁的微笑让我脖子上的肌肉疼痛地抽搐，只有不看屏幕我才能感觉轻松些。

我在新墨西哥时，一天早上，Kent Kiehl 安排扫描了我的大脑。我到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报到，穿上了医院的长袍。我将要完成一项视觉任务——对一系列图片就“道德攻击性”在由 0 到 5 的量表上打分。

我爬上轮床，一位技术员将内部装有显示器的头盔调整好，然后缓缓将我送进了棺材一样的扫描舱内。有一瞬，惊慌向我袭来。我右手拿着按键装置，一会用它来给图片的攻击性打分。关注我右眼的虹膜扫描仪将在我做决定时记录我注视的图片部位。头盔上传来 MRI 技术员那抚慰人心的声音，指导着我。实验的主要设计者 Carla Harenski 则在隔壁房间监督着整个过程。

fMRI 机器发出音调很高的飕飕声。我开始看照片。一张是沾满血的小宝宝。我先想到血，然后意识到情景——出生——给它的道德攻击性打了 0 分。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脸被打得血肉模糊：这个我打了高分。有一张奥萨马·本·拉登的图片。我打了四分，尽管我觉得我是在做智力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判断。有俩人在足球比赛里不慎撞头，这张图开始得了 0 分，但后来我把它改成了 1，因为也许是犯规呢。我想过故意地答错，像冷血症患者那样。然而我还是如同一个五年级好学生般，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那晚，和 Kiehl 以及他的三位博士后在学校旁边的餐厅见面时，我拿来了扫描图像给他们检查。精神研究组织给我刻了张盘，我又把图拷到了笔记本电脑里。“在酒吧里看你的脑图像总是不错的。”Kiehl 边说边挑出居中的一张切片图。“嗯，看着正常——所有部分都在。”他默默研究了几秒图像。“你的胼胝体看着有点薄，”他说，“等等，这是中央的切片图么？啊，是的。嗯。是的，它是薄了。”胼胝体是左右脑的细长连接物。

“那意味着什么？”我问。



“不确定。”Kiehl 说。“我们需要你的完整病历来解读它。”他说他会分析数据再拿给我，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结果。同时，我又严厉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那些道德选择。最终，博士说我没问题。

Kiehl 对他的便携式扫描仪有大打算。2008 年夏天，为了扫描高风险青年，他将它移到阿布奎基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少年拘留所里。法律上，扫描未成年人比扫描成年人更复杂——被试和他们的家长都得签知情同意书——但 Kiehl 说他已经成功招到了一百五十名志愿者。利用青少年版 PCL，他在这些小孩中确定了五十多个得分超过 30 的。

虽然心理学家不把未成年人称作“冷血症患者”——他们是“有冷血症特征的青年”——但有相当证据表明，症状出现的年龄早于十八岁；2005 年的《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刊登了一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七岁儿童的重要基因风险的证据》。该文作者 Essi Viding 指出，症状可以在儿童早期检测到。对研究者而言，年轻的冷血症患者尤其有趣，因为普遍认为他们的脑袋比成人更具可塑性。2006 年的一项关于专门谈话治疗项目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研究在威斯康星的一个少年拘留所里展开，它涉及 141 名在青少年版量表中得到高分的未成年罪犯。在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讲师和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 Michael Caldwell 报告：一旦获得假释，接受过治疗的少年比控制组的少年更有可能摆脱麻烦。“也就是说”，Kiehl 告诉我，“毕竟精神病态是可治疗的，要是你逮得足够早的话。”当然，正如他在一封电邮中指出的，就算面对十分暴力的年少罪犯，我们也得承认，“确知治疗是否奏效的唯一办法，是在刑满之后把他们送回社区中……重新释放后，或许你可以将他们置于一个专门的社区或监控项目中。”

迄今，Kiehl 已经用那台轻便仪器扫描了九十个成年冷血症患者的脑。他说，数据证实了他的假设——冷血症和边缘部位的功能缺损相对应。“如果你把冷血症患者的脑图像放在控制组旁边，就很明显了。”他对我说。威斯康辛大学的 Joseph Newman 对 Kiehl 的假设总体很感兴趣，他希望用这些新数据改进自己的模型，不过，他觉得目前它仍然“是个相当模糊的理论。”

今年秋天，Kiehl 计划将扫描仪搬到 Grants 附近的一个女子监狱去。“据我所知还没人扫描过女性精神病态者。”Kiehl 说。除了在精神病态研究领域，他还可以预测这台轻便扫描仪在很多神经生物学研究上的应用。“你可以把它带到伊拉克，上战场前给他们都扫扫，然后下战场后再扫描，用这些数据可以研究创伤后精神压力综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他建议。共情和道德推理的研究者也会想一试 Kiehl 的扫描仪，但他们得要付得起每小时五百美金的使用费。最近，世界顶尖的共情研究者之一、芝加哥大



学的社会神经科学教授 Jean Decety 前往西部，用那台扫描仪研究了合作项目中 Kiehl 的一些被试。

当 Kiehl 和他的同事在寻冷血症的生物标志时，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在试图通过 DNA 研究找出基因标志了。在最近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一项研究中，Guillermo Ponce 和 Janet Hoenicka 指出：两个与严重酒瘾有联系的基因同样可能和冷血症有关。在神经生物学探索的其他领域，人们也正在努力进行包括行为、神经化学、药理学以及心理生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如果可以为冷血症建立生物学基础并开发出药物治疗的话，那人们就能很好地接受一个观点——很多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冷血。如 Kiehl 所指出的：“在五六十年代，要让抑郁症满足治疗标准通常都很难。然而，DSM 第四版已经把抑郁症的定义如此泛化，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到达了它的标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药物公司在游说改变标准——因为他们有方子，即那些可以在中度抑郁时帮助人们的药物。这个做法合适与否就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他补充道：“中度的冷血症终有一天也会被当成一种精神障碍——尤其是如果我们可以治疗的话。”

像研究冷血症领域的很多人一样，Kiehl 也明白把冷血症当作一种精神疾病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比如，对治疗没有反应的少年冷血症患者，拿他们怎么办呢？对他们的羞辱的影响是深远的。不难想象某天，人们发明了某种犯罪潜力指标，每个人的冷血症风险都在年龄很小时就确定了。Kiehl 最近成为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和神经科学项目（the MacArthur Foundation’s Law and Neuroscience Project）的一名科学家成员，该项目就将研究一些神经成像的法律影响。

冷血症同样带来了关于司法的基本问题。我们司法体系的核心是有理智的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美国没有针对冷血症患者的精神错乱辩护。）芝加哥大学的 Decety 这么对我讲：“我们基本上仍然运行在一套圣经式的惩罚系统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考虑在多大程度上罪犯的行为是故意的。但神经科学正给我们展示的是，大量的犯罪源于冲动——罪犯无法自控。这点一旦清晰起来，一旦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司法系统将如何应对呢？” Joseph Newman 说：“我四处给监狱的工作人员作演讲，告诉他们囚犯不只是混蛋，然后警卫就上来了：‘很喜欢你的讲话，博士，但你是在说这些家伙对他们的罪过都没责任么？’”

Kiehl 希望通过下个十年从众多种族群体中建立起一个有一万名冷血症患者的数据库——男性、女性和少年——数据库包含他们的扫描脑图像、DNA 以及病史。这个数据库能像 Johnson 博士的词典服务语言学家一样，为精神病态的研究者服务——作为初始参考。至



于这些数据能否保证人们将精神病态视为一项精神障碍，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Hare 说："仍然需要收集大量被试的生平数据，并把它们都和脑扫描结合关联起来，才能让那些图像有意义。"而且就算到了那时，我们仍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行动起来会不顾良知。

尽管如此，对 Kiehl 而言，有了轻便式 fMRI 就像是一个体育梦想变为现实。"有时早上起来，我真不敢相信，一切都有了：扫描仪，实验室，我们在积累的数据。这就像赢了超级杯一样。"

（本文选自科学松鼠会。译者达文西。）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徐贲：人为什么会作“残忍”之恶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教授，爱思想网学术委员。

“

巴伦-科恩的解释是，恶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 一字）。他以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特别无情的和特别替人着想的人都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处于中间。

”

在网易上读到一则发生在苏州的事情：2012 年 10 月 6 日晚，苏州一名女子在该市一商场的停车场内准备上车时，遭遇持刀抢劫被割喉，腿部也被刺了一刀。这条残忍行凶的消息有 8 万多条跟贴，有一条说，“逼近基尼指数极限，经济衰退，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的”。还有一条说：“昨天是宁波，今天是苏州，受害者仍然是女子，仍然是割喉！对待恶性刑事犯罪当用重典。”

我正好在读一本去年才在美国出版的关于“残忍”的新书，叫《恶的科学：论同情与残忍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这本书要是在中国出版，也许会遭到上面两位网友的痛骂，因为作者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残忍”问题上的观点是，人做出残忍的事情，是因为他的心理有“同情障碍”，形成了人格发展的自然缺陷。虽然巴伦-科恩也考虑到残忍者的环境生长条件（如儿时受到侵害和父母虐待），但他认为残忍主要与当事人的脑部基因状况有关。这种看法虽然与基尼指数极限或者不重罚则犯罪频发的外因决定论相左，但同样也是一种决定论。

《残忍》一书在美国受到关注，是因为残忍是美国人在生活中经常碰到，但又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释的问题。人们通常用“恶”来言说残忍，而恶是什么呢？恶又体现为怎样的社会行为呢？巴伦-科恩的解释是，恶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 一字）。他以生物医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特别无情的和特别替人着想的人都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处于中间。

这与大卫·史密斯（David L. Smith）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2011）一书中对残忍的讨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史密斯说，我们如果把别人当与自己相同



的人来对待（也就是具有“同情”）时，就不会有残忍的行为。马克·吐温说过，“人类是唯一残忍的动物”，但是，史密斯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残忍对待他人的幻想。谁没有想象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因为你觉得将渴望复仇的白日梦变成现实是错误的，然后就克制住了。或者也许你确实施行了报复，但是报复手段却没有幻想的那么夸张（你只是发了一封令人不快的邮件，而不是把他们大卸十八块）。人们在想象残忍行为时的愧疚程度与他们眼中该行为的残忍程度成正比。而愧疚程度则与约束程度成正比。这便是为什么杀人和折磨人的行为很难实施，尤其是在正常情况下”。

心理学家们讨论“正常情况下”的残忍，因为只有在正常情况下，人才必须，也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人普遍关心人的行为责任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的自由选择和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担负个人责任。但是，他们也知道，人的行为并不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社会应该重视人有时会身不由己的情况，这是因为，兼顾个人责任和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事关整个国家社会的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巴伦·科恩讨论残忍的心理成因，将它与个人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正是在美国的法治文化环境中受到人们关注的。他在一次访谈中强调，“对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并不叫他为他的幻觉负责；对糖尿病患者，我们不叫他为他的口渴负责。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水平低，我们说那是因为他的细胞对胰岛素反应不正常，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他的行为的生物医学原因。同样，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低同情心所造成，而那又是因为他头脑的同情电路 （empathy circuit）不起作用，那么这个人该在什么意义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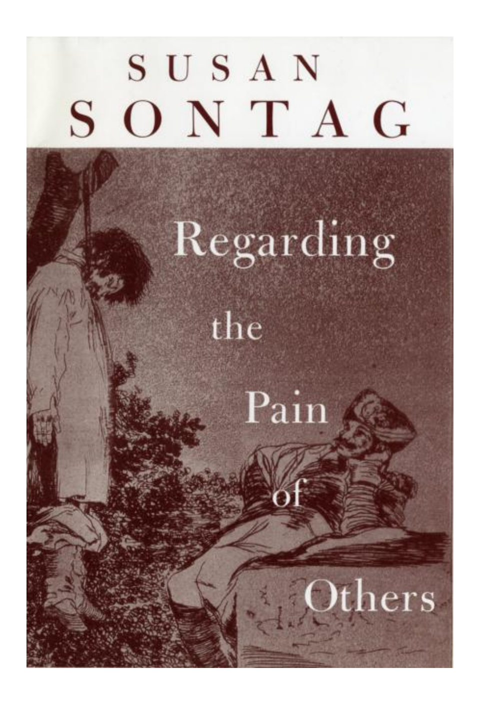
巴伦-科恩对大脑基因决定人的残忍的看法在美国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担心，对犯罪行为的单纯心理学解释会给一些人制造逃脱刑责的借口，心理理由是很容易被滥用的，应该对此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例如，一个人明明犯下了残忍的谋杀之罪（如薄谷开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这个人以“犯案时行为控制能力弱”为理由得到减刑？生物医学对残忍的解释也许可以满足人们的知识好奇，但不应该成为开脱残忍犯罪的借口。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编辑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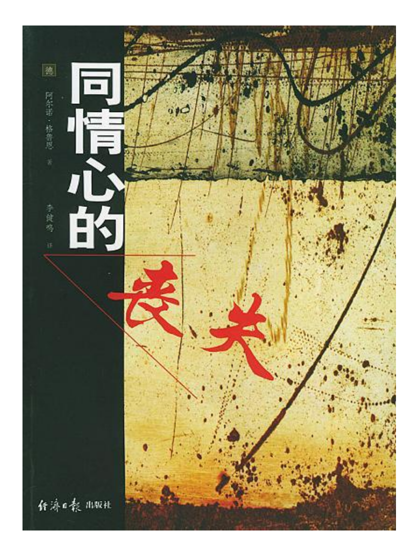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苏珊·桑塔格继《论摄影》之后又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本书聚焦于战争摄影，探讨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影像尽管能唤起观者的悲悯之心，但人们的无能为力感更让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 “……（把苦难放大、全球化）一个在这样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 若不经思考而直接相信影像之内容，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只会愈来愈弱。桑塔格以纯文字书写影像，为观者提供思考空间以正视“他人的痛苦”。

格鲁恩《同情心的丧失》



为什么今天在世界各地，经济的崩溃、衰退、战争、破坏、仇恨、兄弟反目、暴力、吸毒、



犯罪、对妇女和儿童的歧视、野蛮和残暴行为日益加剧了呢？难道出现这一危机的原因仅仅是国家、经济和技术的问题？不，这一危机涉及到人的定义，涉及到我们自己对人的理解。

本书的宗旨同情心的历史、其发展和命运的角度去理解人这一物种。书中强调同情心是我们内心抵御非人性的堡垒。我们的文明史不仅同压制和扭曲同情心交织在一起，而且对同情心的压榨和扭曲也是文明史的基础。



【FMN 新闻】

芦山县 4.20 地震

4 月 20 日 08 时 02 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 30.3 度，东经 103.0 度）发生 7.0 级地震，震源深度 13 千米。这是 2008 年的 5.12 汶川地震之后四川地区发生的最大强震，四川其他地区、重庆、陕西、湖南等地都可感受到强烈震感，截至 10:19 雅安地区已经发生了十余次 3 级以上余震。

新闻：http://fmn.cc/XYEJGI

http://fmn.cc/XYEXhk

据四川省民政厅 23 日 6 时统计，四川省芦山“4.20”7.0 级强烈地震已造成 193 人死亡、25 人失踪、12211 人受伤。不过因为道路险阻，救援难度大，天全县、灵关镇等受灾同样严重的地区目前没有接收到正在物资或者物资殆尽，重灾区的民众正期盼早些迎来救援。

新闻：http://fmn.cc/13wJF6w

4 月 20 日的 7 级地震中，四川宝兴县灵关镇也受到了严重损失，不过有媒体报道称，该镇民众不缺物资甚至在吃肉，23 日当地居民举牌抗议政府不向他们发放物资。网友称，“很多灾民是吃冰箱里面存的肉，没有电，肉开始变质，喝的是生水。”还有人提到当地出现了群发性腹泻等情况。

新闻：http://fmn.cc/13wJEiM

地震发生后，虽然政府调动了大量物资运往灾区，但是仍有村庄缺乏物资，4 月 22 日晚芦山县太平镇村民，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都没电没水没吃的三天了没人管的。四川天全县新华乡书记甚至对媒体称，他们是被遗忘的角落。一些偏远村庄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救援。

新闻：http://fmn.cc/ZOHrw5



http://fmn.cc/ZOHxUB

四川作家李承鹏在雅安发生地震后第一时间组织了民间队伍赶往灾区赈灾，并将相关情况通过微博公布。事后他为此撰文，讲述了在灾区的见闻，肯定了官方救援队伍的效率，但也提到一些偏远地区被遗忘。同时回应了外界有关他“作秀”的看法。

新闻：http://fmn.cc/ZOHzfc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芦山县地震发生后赶往灾区，他们表示道路险阻，历经辛苦才抵达芦山县。报道称龙门镇房屋大多受损，但人们仍表现出了乐观的精神，芦山县的震后恢复情况较好。

新闻：http://fmn.cc/XYGGDi

由于进入灾区的道路被来自各方的车辆堵塞，国务院发出号召要求没有许可的民间团体不得进入灾区。而参与救援的团体也感受到了力不从心，由于缺乏有效协调与合作、信息混乱，这次 NGO 在救援中遇到不少困难，形成联合救灾组织也并非易事，专业人士认为，这是发展中的一个必经过程。

新闻：http://fmn.cc/ZOCtj1

芦山县清仁乡副乡长杨成毅因工作不力，责任心不强，造成一些严重的工作失误遭到免职。据悉作为驻村干部的杨成毅因事发时赶往另一村庄救灾，导致横溪村物资发放时出现“哄抢”情况，不过这名灾后每天只睡 3-4 小时、忙于救灾的干部并未感到不满，而是坦然接受，目前被派驻到另一村庄参与救灾工作。

新闻：http://fmn.cc/ZOD2t8

截至 4 月 23 日上午 11 点 30 分，芦山 7 级地震导致雅安市辖区伤亡师生 65 人。其中，死亡学生 14 人，教职工受伤 9 人，受伤学生 42 人。08 年文川地震后复建的芦山中学也在此次烈度为九的地震中受损，受到影响的高三学生将在这个周末之前尽快复课。

新闻：http://fmn.cc/XYGQu8

http://fmn.cc/XYDVSh



习近平 4 月 23 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部署芦山抗震救灾；会议前政治局全体起立为地震遇难者默哀，强调多难兴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会议还要求，要大力宣传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崇高思想、先进事迹，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增添新的正能量。

新闻：http://fmn.cc/XYGMe0

中国慈善机构受到质疑

2011 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以及之后红十字会发生的一系列善款丑闻，导致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失去信任，来自民间的善款流向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等组织和个人，红十字会通过官网和电视呼吁民众积极捐款，但效果惨淡。

新闻：http://fmn.cc/13wJCaL

面对社会的压力，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坦言，目前还无法做到每一笔捐款的去向都详细公示，但红总会争取做到。“对特别恶意的诬陷造谣，中国红会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还有红会的官员表示，红会不能去官方化，级别高一点更好发挥作用。据悉红会的级别相当于副部级。

新闻：http://fmn.cc/ZOHFDB

http://fmn.cc/XYHsju

由于在芦山地震中饱受非议和批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 5 月中下旬，即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据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

新闻：http://fmn.cc/ZOHGaB

不愿捐款给官方的不止内地民众，香港政府提出将向灾区捐资 1 亿港元，网络民调显示九成民众反对捐款，香港多个泛民政党因担心款项遭挪用而提出动议，要求规范善款的使用。



有媒体人撰文批评内地官员挪用善款，用于造政府大楼、购置豪车，甚至维稳丧子父母，称令人心灰意冷。最终香港立法会 24 日未就捐款事宜进行表决。

新闻：http://fmn.cc/13wJyb5

高校学生新闻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去世女孩吕令子的父亲泣不成声地说："对我们家而言，得知吕令子遇难消息的一刻是最痛苦的时刻，每当我们说到这件事，它就像一把匕首插在我们心里。"友人和老师都认为吕令子是个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女孩，她的去世令人们无限悲伤。

新闻：http://fmn.cc/ZOGPqb

18 年过去，当年清华铊中毒案的受害者朱令重新回到公众视线，父母称，她一直很坚强，而且比以前的状况好转，但仍像个小孩子，他们担心未来父母不在以后，她该如何安顿。

新闻：http://fmn.cc/ZOGQue

复旦毒杀案嫌犯林某被媒体揭示性格存在矛盾的一面，既优秀、自律，却又十分执着、记仇，同时与他人、特别是异性交往存在障碍，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琐事，可能是他最终杀害他人的原因。据悉黄洋入院后，林某的表现自若，没有出现异常，对于下毒原因，他则不愿袒露。

新闻：http://fmn.cc/ZOH4Sc

英国媒体每日邮报 4 月 23 日报道， 音译为李洋的 26 岁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巴斯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因为论文只得到 37 分而面临毕业延期。他试图行贿导师来获得毕业资格，遭到拒绝后一把手枪还从上衣口袋中滑出，导师指控他行贿以及携带枪械，他因此被判入狱 12 个月以及 6 个月监禁，据悉这名学生的父亲是一名官员和商人。

新闻：http://fmn.cc/XYKV1F

本周其它重点新闻

香港《大公报》4 月 18 日首发一则新闻，称今年 3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只带一名随行人员的情况下在北京街头打车，报道发出后迅速成为 18 日网络最热讨论话题。但 18 日傍晚，新华社辟谣称上述事件为虚假新闻，令公众错愕不已。

新闻：http://fmn.cc/13wJvfe

http://fmn.cc/17YNmVT

中央社消息称，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4 月 24 日下午宣布，一名 53 岁男性感染 H7N9 禽流感，这名台商曾于 3 月 28 日到 4 月 9 日在江苏苏州工作，4 月 9 日由上海返回台湾，12 日出现发热症状。据悉患者在苏州期间并没有禽鸟接触史、也没有食用未熟禽类或蛋品。

新闻：http://fmn.cc/13wJw2P

4 月 23 日中午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发生严重暴力袭击事件，事件共造成 15 名民警和社区干部死亡，还有 6 名袭击者被击毙，官方认定这是一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报道称，赶来的众人遭多名暴徒持 1.2 米长刀具伏击，唯一携带手枪的派出所所长打光了 6 颗子弹，仍未能突围，众人被逼入一个房间。暴徒随后堵死房门，灌入汽油，并纵火将众人活活烧死。据悉，遇害者中包括色力布亚镇副镇长孙超。

新闻：http://fmn.cc/XYJcJG

4 月 19 日晚，辽宁发布对马三家劳教所相关报道的调查结果，称文中报道不实，表示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多年来始终坚持党的劳教工作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将 LENS 的报道定性为法轮功的“抹黑”。

新闻：http://fmn.cc/XYJhgt

网友曝光 4 月 19 日晚，江苏泰州滨江工业园区招待中心管委会豪华宴请，却被当地上千民众围堵在酒店，管委会书记甚至下跪求饶希望放人，事件引发关注，泰州方面表示会成立工作组处理此事。

新闻：http://fmn.cc/XYJose



4 月 22 日，来自河南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聚集在河南省政府门前，要求河南省执行并落实民政部 2009 年下发的 26 号文件，尽管下雨人们仍打起横幅，不过现场出现冲突，一名现场摄像的志愿者遭到殴打并被逮捕。

新闻：http://fmn.cc/13wJtUJ

4 月 23 日上午 9:30，刘霞的弟弟刘晖被控诈骗一案在北京怀柔区法院开审，由于刘霞早先坚持要求参加旁听，此次她也离开被软禁的家中出现在法庭外，刘霞说，“今次是特批，仍不算获得真正自由，希望以后日日都能自由活动”。据悉，怀柔法院外有大量警察拉起封锁线，每隔两三步就有人站岗。显示当局对案件的紧张程度。

新闻：http://fmn.cc/13wJsQy

法制网报道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共同发布了《北京 PM2.5 中重金属浓度检测研究》，该项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大气及个体样本进行重金属浓度检测和分析发现，北京 PM2.5 中可致癌重金属砷的浓度偏高。该项研究建议，国家开展重点地区有毒空气污染物监测。

新闻：http://fmn.cc/ZOEPOJ



主编：方可成

编辑：宗洁 王陶陶 黄海

设计：潘雯怡

校订：李佳凝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